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一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九年六月

清代六種文帝類全書的出版史研究

胡劼辰*

本文主要從出版史研究的角度，考察作者從中、日、美、歐各地的公共圖書館及大學中所收集到的不同版本文帝類全書，並且整理出相應的版本流傳過程，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清代文帝信仰之文獻學研究的空白。

《文帝全書》是清代影響最大的文昌帝君信仰相關合集。它成書於乾隆初，在有清一代重編、重刊不下十次，地點遍佈多個行省，並且衍生出了諸如《文帝書鈔》、《文昌聖典》和《文昌帝君全書》等一系列文昌文本的合集。

本文也將指出，文帝類全書意圖構建「儒教正宗」的特殊歷史現象，反映清代信奉文昌帝君的儒生士人一方面試圖通過儒教觀念擴充文帝信仰的內涵，另一方面也試圖通過文帝信仰相關的扶乩活動和實踐重塑他們心目中的儒教。這一動態過程有別於經學傳統中的儒教，但同樣是構成帝制晚期中國宗教光譜的重要一環。

關鍵詞：《文帝全書》 文昌信仰 扶乩 清代儒生 善書

*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代文昌帝君類合集的收集、整理與研究」(18CZJ020)的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文帝」，為「文昌帝君」的簡稱，也是明清時期對文昌神的常用稱呼之一。文昌神的崇拜有著悠久的歷史，在不同時期呈現為不同的神格特徵，也有著不同的稱呼。文昌神的信仰大致上有兩個淵源，一是東周時期就已經存在的對文昌星的星宿崇拜，二是古蜀地梓潼地區對梓潼神這位地方神的崇拜。¹ 人格化的文昌神大約成型於宋代，並在這一時期從地方崇拜擴展成為全國信仰。² 文昌神最遲至元代被升格為帝君，³ 並且在清代嘉慶年間納入國家祭祀系統。⁴ 因此以「文昌帝君」（抑或「文帝」）來稱呼文昌神的現象主要流行於明清。清乾隆十年（1745）左右成書的《文帝全書》可以說是文帝信仰發展的里程碑，⁵ 在有清一代重刊、增輯了不下十次，衍生出不同卷數的版本，以及諸如《文帝書鈔》、《文昌聖典》、《文昌帝君全書》等一系列合集。以下將之統稱為「文帝類全書」。

在時間上，從乾隆至於光緒，幾乎歷朝皆有文帝類全書的重刊之舉。在空間上，其刊刻地點出現於至少八個行省。⁶ 參與編纂重刊的人員，上至朝廷翰林達

¹ 古梓潼神相關信仰的研究，可參高梧，《文昌信仰習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 3-21；張澤洪，〈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文昌帝君〉，王興平等編，《中華文昌文化——國際文昌學術研究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 116-121；Terry L. Kleeman, *A God's Own Tale: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of Wenchang, the Divine Lord of Zito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p. 1-27.

² 相關研究可參森田憲司，〈文昌帝君の成立——地方神から科擧の神へ〉，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頁 389-418；Terry L. Kleeman, "The Expansion of the Wench'ang Cult," i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ed. Patricia B.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45-73；王見川、皮慶生，《中國近世民間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239-250；謝聰輝，《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頁 97-174。

³ 在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頒布的加封敕文中，已經出現了「蜀七曲山文昌宮梓潼帝君」和「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的稱呼，可以視作梓潼神正式被國家承認為「文昌帝君」。如今存世的敕文全文中，最早的版本當屬明《道藏》中《清河內傳》（DZ169）後所附的〈元加封寶誥〉。

⁴ 文昌帝君於嘉慶六年（1801）被納入祀典、咸豐六年（1856）升入中祀。清·崑岡等總裁，《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清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卷四三七。

⁵ 據筆者目力所及，北京大學所藏德馨堂本《文帝全書》為僅存的初本《文帝全書》，但此為殘本，存十八冊三十二卷，遺失所附《羣真著述》。後世重刊的《文帝全書》篇幅都為二十冊左右，卷數則從二十八至五十不等。下詳。初本編者為劉樵，多稱劉體恕，亦係初本《呂祖全書》的編纂者。

⁶ 《文帝全書》重刊的時空分佈可參文末附表。

官，下至地方鄉紳方士。在內容上，文帝類全書既囊括了清代之前產生的幾乎所有的文昌信仰相關文本，又常常作為底本影響包括《道藏輯要》在內的有清一代的宗教類文獻，⁷ 其所收錄的文本也常常單獨刻印行世，因此它在文本傳遞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此外，文帝類全書的編纂團體既展現出了清代文昌信仰及其宗教團體的不同形態，又往往與信奉其他神明的宗教團體和乩壇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部分團體則同時信奉多位降乩的主神。例如初本《文帝全書》的編輯者劉樵及其世侄劉占爵，同樣也參與了湖北武昌的呂祖乩壇「涵三宮」的活動，並一同編纂初本《呂祖全書》。劉占爵還參與了不久之後憩園重刊本《文帝全書》和《呂祖全書》的校讎工作。於乾隆四十年重編、刊印五十卷本《文帝全書》的江南團體中，既有偏重文帝信仰的惜字會成員，也有偏向信奉呂祖的士人，這一團體在幾乎同一時期也重編、刊印了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乾隆五十六年前後，吳惠為首的團體在重刊《文帝全書》之後，曾一度有意編纂關帝類全書，礙於當時可以收集到的關帝降乩文本數量有限，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編纂了《武帝彙編》作為《文帝全書》的附錄。而在道光八年的四川地區，以甘雨施為首的宗教團體不僅以《文帝全書》為底本編纂刊印了二十八卷本的《文昌帝君全書》，同時也編纂刊印了一部《關聖帝君全書》。換言之，從宗教社會史的角度來看，文帝類全書的背後並非是一些孤立的團體，而是與整個清代文人的扶乩信仰、出版實踐及乩壇網絡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近年來，學界逐漸注意到清代產生的神明類全書的編纂之於帝制晚期中國宗教研究的重要意義。如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最近就文帝、呂祖和關帝三者的全書在清代的出版這一歷史現象專門撰文進行了宏觀的分析，尤其強調相關文本和祀典兩個層面的正典化 (canonization)、扶乩活動以及救世型神明這三個元素在這一出版現象中呈現的交錯關係。⁸ 此外，《呂祖全書》和《關帝全書》的相

⁷ 《重刊道藏輯要》收錄有文昌經 7 種，分別是《洞經示讀》(JY007)、《文昌帝君本傳》(JY254)、《文帝化書》(JY255)、《文帝孝經》(JY256)、《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JY257)、《文昌延嗣經》(JY258)、《陰騭文註》(JY259)，大多落款有「大興朱珪石君敬校」字樣，且文本也與《文帝書鈔》同，因此可以推斷出，《重刊道藏輯要》所收文昌經的底本是出自《文帝書鈔》。

⁸ Vincent Goossaert, "Spirit Writing, Cano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Divine Saviors: Wenchang, Lüzu, and Guandi, 1700-1858," *Late Imperial China* 36.2 (2015): 82-125.

關研究也都各自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⁹ 但是相對於《文帝全書》所具有的重大研究價值，其研究成果卻幾乎是白紙一張。至今尚未有一本專著、甚至一篇專文對其進行最基本的研究。¹⁰ 一定程度上，這也與近年來宗教文獻的學術出版情況有關。無論是《呂祖全書》抑或是《關帝全書》，都已有數種版本被全文影印出版。¹¹ 而文帝類全書尚未有任何一個版本被收入近年出版的任何一種叢書中。

⁹ 《呂祖全書》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黎師志添先後發表的兩篇長文，梳理了乾嘉年間先後成書的四種《呂祖全書》、它們對後世《道藏輯要》等文本的影響以及這些文獻產生的社會處境和宗教史意義。參黎志添，〈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2(2013)：183-230；黎志添，〈《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6(2015)：101-149。在此之前，尹志華和李家駿也發表過一些先行的版本研究。參尹志華，〈《呂祖全書》的編纂與增輯〉，《宗教學研究》2012.1：16-21；李家駿，〈《呂祖全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論文，2012）。另外，森由利亞和莫尼卡（Monica Esposito）兩位學者也先後注意到了《呂祖全書正宗》一書，並在研究蔣予蒲與《道藏輯要》的語境中提及和引用該書。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東方宗教》98(2001)：33-52；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宗教學研究》2010.3：17-27。《關帝全書》方面，高萬桑曾撰文介紹和分析清代不同的關帝類單行文本和合集，以及它們在關帝文本正典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參 Vincent Goossaert, “The Textual Canonization of Guandi,” in *Rooted in Hope: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Roman Malek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ed. Barbara Hoster, Dirk Kuhlmann, and Zbigniew Wesolowski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2017), pp. 509-526。另外，筆者最近發表的研究初步梳理了清代前中期關帝類合集的文獻史，參胡劼辰，〈明清關帝文獻初探：清代前中期關帝類合集的文獻史研究〉，《道教學刊》3(2019)：92-115。

¹⁰ 除了上引高萬桑文之外，較早意識到《文帝全書》研究價值的是游子安，他曾以《文帝全書》為例探討清代扶乩實踐和善書編纂的關係，不過游氏也未能處理文獻史的相關問題。參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頁 54-55。

¹¹ 已經影印出版的《呂祖全書》包括：(1) 清·劉樵編，《呂祖全書》三十二卷（疑似清乾隆刊本，收入《藏外道書》，成都：巴蜀書社，1992-1994，第 7 冊）；(2) 清·劉樵彙編，羅圓吉續編，《呂祖全書》三十三卷（清光緒五年刊本，收入《中華續道藏·初輯》，臺北：新文豐，1999，第 19 冊）；(3) 孚佑帝君釐定，在壇諸子校字，《呂祖彙集》二十卷（清咸豐間刊本，收入《中華續道藏·初輯》第 19 冊）；(4) 清·劉樵彙集，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六十四卷（清乾隆四十年刊本，收入《中華續道藏·初輯》第 20 冊）；(5) 清·李涵虛輯，《呂祖全書》（空青洞天藏版，收入《道藏精華》第 9 集，臺北：自由出版社，1967）。而已經影印出版的《關帝全書》包括：(1) 清·黃啟曙編，《關帝全書》（清咸豐八年刊本，收入《關帝文獻彙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第 6 冊）；(2) 張羽新編《關帝文化集成》（北京：線裝書局，2009）也收錄了《關帝全書》一種，筆者未見。

而且，其中不少版本尚以近乎孤本的形式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中。

此外，曾涉及到《文帝全書》的研究也並不多。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對其進行簡單的文獻描述和記錄。如陝西商南賀箭村在上世紀三〇年代編纂的《古今善書大辭典》，其中收有「文帝全書」條，所據當為光緒以後的刊本。¹²除此以外，早在光緒年間，就有西方傳教士發現光緒二年刊本《文帝全書》，並且翻譯部分內容（主要是序言、卷一的〈文昌帝君本傳〉和一小部分文本），在「蘇州文學聯合會」（Soochow Literary Association）上宣讀和討論，以基督教的視角來理解其中的內容，似乎是為了幫助（以傳教士為主的）聽眾更好地理解 and 批判當時中國流行的宗教思想。¹³

另一類則是將其視為某部文獻的一個特定版本。如善書專家酒井忠夫，在考察《陰騭文》時曾將《文帝全書》視為一個重要的版本來源，但並沒有對《文帝全書》本身進行任何的研究甚至闡述。¹⁴另外，祁泰履（Terry L. Kleeman）對《文昌化書》的研究，也提及過《文帝全書》，並且已經注意到不同的版本。¹⁵除此之外，謝聰輝和謝政修的研究也都使用《文帝全書》中所收《文昌化書》，並且將後者推斷為南宋本，認為其底本內容當早於明《道藏》所收元本《梓潼帝君化書》。¹⁶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出版史的角度來考察已知的各個版本文帝類全書，¹⁷

¹² 筆者未見賀氏原書，所據文本為游子安《勸化金箴》一書中〈附錄二·《古今善書大辭典》〉，頁 258。根據其描述，其所見版本當與今日所存光緒二年刊本最為接近，唯一區別在於今日所存光緒二年刊本為「常郡陽邑廟文昌閣」藏板，而賀氏所錄為「上海翼化堂」藏板，該版《文帝全書》今或不存。

¹³ Rev. D. N. Lyon, "Life and Writings of God of Literature (文帝全書),"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20.9 (1889): 411-420; "Life and Writings of God of Literature (文帝全書),"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20.10 (1889): 439-449.

¹⁴ 酒井忠夫，《增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99-2000），頁 516-517。

¹⁵ Kleeman, *A God's Own Tale*, p. 294.

¹⁶ 謝聰輝，《新天帝之命》，頁 117-132；謝政修，〈《文昌化書》研究：以七十四至九十七化為主〉（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¹⁷ 本文所謂「出版史」的學術角度，是借用井上進研究「出版文化」的相關洞見，即「如果研究的問題不在於學說或思想本身，而在於它如何被接受和流行，進而朝著一定的方向發展並形成潮流的話，對於出版文化的考察則成為必不可少的研究」。井上進，〈出版文化與學術〉，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475。因此本文並非是要探討版本價值的高低，而是試圖還原文帝類全書的文獻史及其出版背後的編纂動機和社會處境。

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維度：一是以書志學的方法對已知版本進行考證、爬梳和整理，以還原文帝類全書的編纂歷史和版本流傳，既是未來研究的基礎，也填補了學界的一處空白；二是從編纂團體及其編纂、刊刻的動機，以及不同版本所具有的不同特點出發，來探討這些團體通過文帝類全書意圖構建出的文昌帝君作為「儒教正宗」的全新形象，以及他們賦予這一定位的具體宗教內涵。

經過筆者近幾年的搜集，目前在中、日、歐、美各地圖書館一共找到超過二十個不同版本的文帝類全書及其節錄本，大致可以劃分為六類，分別是：(1) 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2) 五十卷本《文帝全書》；(3) 三十八卷本《文帝全書》；(4) 《文帝書鈔》；(5) 《文昌聖典》；(6) 《文昌帝君全書》。其中，五十卷本和三十八卷本可以視為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的擴充，不僅保留原書的書名，總體而言也維持原書的大致結構；而另外三種合集則可以視為《文帝全書》的衍生版本，在結構上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更改。不同版本的存世情況可參文末附表。

以下的考證和研究，主要側重的方面包括：(1) 成書的時間、地點和編纂者；(2) 所採用的底本以及在文本傳遞鏈上的位置；(3) 文本的收錄情況等等。主要依據的分析材料是各個版本的副文本——包括封面、序、跋、凡例和目錄。由於本文的分析主要以單個版本為基本單位，因此全書中所收錄的單篇文本的具體分析不在本文所涉範圍之內，容日後再做深入探討。

二・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

(一) 初本《文帝全書》的確立

在諸多不同版本的文帝類全書中，初本《文帝全書》成書於乾隆八年至十年(1743-1745)左右，現存一殘本，見藏於北京大學。不過這一結論並非是自明的，而是通過不同文本的內外部證據、結合一系列的考證從而得出的。因此，以下部分首先通過各種材料，來考證出初本《文帝全書》的成書時間和背景，以及北京大學所藏德馨堂本《文帝全書》即初本的結論。

初本《文帝全書》的主要信息，是從乾隆四十年(1775)的重刊增輯本《文帝全書》中獲得的，該版本《文帝全書》共計五十卷，其主要編纂者為關槐，因此以下簡稱為「關本」。關本暫且看來是目前存世藏本數量最多的一個版本，不

過絕大部分館藏都位於日本，另外北京大學和哈佛大學也各有一套入藏。¹⁸ 目前，早稻田大學掃描上傳的關本，是唯一一套學者可以公開免費獲得全文的《文帝全書》。以下，將從早稻田大學藏本出發，輔以其他一手文獻，來考證初本《文帝全書》的相關信息。

用關本來考證初本《文帝全書》的主要原因在於，關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初本和其餘底本的副文本，也在其本身的序言和凡例部分，詳細講述了初本和其餘版本《文帝全書》作為其底本的基本信息，以及其損益修改的具體部分。關本所收的副文本詳如表一：

表一：關本《文帝全書》所收副文本

序號	題名	落款時間	落款人
1	文帝全書敘畧	乾隆四十年	武林雲軒氏王世陸履階
2	序	無	賜進士及第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長洲彭啟豐
3	序	乾隆三十九年	臨江老人吳穎芳
4	文帝全書贊並序	乾隆三十九年	仁和關槐
5	凡例	無	晉軒關槐
6	德馨堂原序	乾隆八年	義陵劉體恕
	（其二）	無	古鼎劉悟誠
	（其三）	無	武興陳惠榮
	（其四）	無	浣川竹柳子徐立御
7	憩園重刊本序	乾隆十一年	前兩廣鹽運使司分司潮惠汀贛鹽務運同俞文耀
	（其二）	無	古州同守劉樵
8	朱氏書鈔序	無	大興朱珪
9	德馨堂原跋	無	滄亭劉體恕
10	憩園重刊本跋	乾隆十一年	後學劉占爵
11	文帝全書後跋	乾隆三十九年	吳門蔡來鶴

¹⁸ 不過哈佛所藏本每冊的封面上，都貼有「名古屋陸軍地方幼年學校」標籤；內頁有「名古屋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和「東京陸軍幼年學校圖書之印」方印兩枚，可知哈佛藏本也是經由日本轉手獲得的。

根據表一可知，關本除了收錄有本身刊刻時的序跋之外（以背景色標出），還收錄了所謂「德馨堂」的「原」序跋、「懋園重刊本」的序跋和「朱氏書鈔」的序，在此首先要釐清「德馨堂」所指涉的是什麼。

關本凡例第一條稱：「是書劉氏德馨堂舊本卷三十二，自卷一至卷二十四為內函，卷二十五至三十二為外函，《玉局心懺》、《躬行心懺》、《清靜法要》、《清靜法程》、《祿嗣祕訣》、《坤寧妙經》六冊，題曰『羣真著述』，不列全書之內。」¹⁹ 關本的編輯者關槐，也在〈文帝全書贊并序〉中稱：「《文帝全書》五十卷，始纂於義陵劉氏，為三十二卷。」²⁰ 除此以外，多個版本《文帝全書》的序言中，都指向劉氏德馨堂本為初本。例如，上海圖書館藏乾隆五十九年（1794）重刊本《文帝全書》在後跋中也提到：「方知此書肇于常德劉氏。」²¹ 大英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刊本《文帝全書》的〈序〉中稱：「《文帝全書》垂訓世人久矣，始於乾隆癸亥義陵劉氏彙輯內函外函三十二卷。」²² 此外不一一列舉。由此可知，劉氏刊刻的「德馨堂」本就是《文帝全書》的初本，共計三十二卷外加附錄六種。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套未著錄年份的《文帝全書》，當為最初版的《文帝全書》，理由如下：(1) 最重要的一點線索是，如圖一所示，該版《文帝全書》的封面印有「德馨堂藏板」的字樣。²³ (2) 北大該版《文帝全書》共收有〈序〉兩篇、〈跋〉一篇，除了劉樵所書的第一篇〈文帝全書序〉落款時間為「乾隆癸亥」（即乾隆八年，1743）外，其餘兩篇副文本皆無落款，而這三篇序言，在關本中都被歸入「德馨堂原序」。(3) 後出的重刊本中，如若收入早期刊本序跋，除了收有以上三篇副文本外，皆收有武興陳惠榮書於乾隆十一年（1746）的序言，而北大該藏本未收，也間接指向該藏本或成書於乾隆十一年之前。(4) 再者，該版《文帝全書》的版本學特徵也符合清代前中期的特點。由此基本可以斷定，北大所藏該套《文帝全書》即作為初本的劉氏德馨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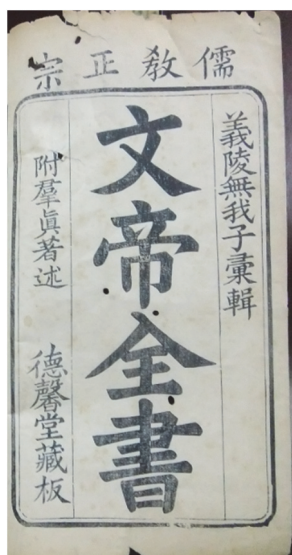
¹⁹ 清·關槐，〈凡例〉，清·劉樵編，關槐增訂，《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卷首。

²⁰ 清·關槐，〈文帝全書贊并序〉，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

²¹ 清·蔣源嶽，〈重刊後跋〉，清·劉樵編，《文帝全書》（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末。

²² 清·蔡傑，〈序〉，清·劉樵編，關槐增訂，蔡傑重刊，《文帝全書》（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倫敦：大英圖書館藏），卷首。

²³ 清·劉樵編，《文帝全書》（清乾隆八年至十年刊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封面。



圖一：北大藏德馨堂本封面

初本《文帝全書》的確立提供了探討版本流傳的基礎。而三十二卷本至少包括以下幾種：(1) 德馨堂本《文帝全書》；(2) 憩園重刊本《文帝全書》；(3) 乾隆五十九年重刊本《文帝全書》；(4) 光緒二年 (1876) 重刊本《文帝全書》。以下部分將從出版史的角度出發，首先圍繞三十二卷本展開研究，具體探討兩個方面的內容：(1) 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的不同版本及各自特點；(2) 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的大致結構和所收文本。

(二) 已知版本的基本信息

1. 乾隆八年至十年德馨堂本《文帝全書》（以下簡稱「德馨堂本」）：

該版《文帝全書》的成書年份，大致可以確定在乾隆八年和十年之間，理由如下：(1) 劉樵在乾隆八年的序言中明確提到，刊刻《文帝全書》是在《呂祖全書》之後，但刊成時間不早於乾隆八年。²⁴ (2) 根據關本《文帝全書》收錄的劉

²⁴ 劉樵稱：「比來彙輯《呂祖全書》，付之開雕，工既竣。因念仙教大宗，呂祖是也；儒教正宗，文帝是也。其實二帝君皆貫通三教人也。今呂祖之全書幸告成矣，其能無意於文帝之全書乎？」清·劉樵，〈文帝全書序〉，氏編，《文帝全書》（清乾隆八年至十年刊本），卷首。

占爵的〈憩園重刊本跋〉可以知道，劉樵開始刊刻《文帝全書》的年份是乾隆七年（1742），刊成時間不詳；而三年之後，則有憩園俞文耀重刊之事，而憩園重刊本的序跋時間，皆為乾隆十一年。²⁵ 因此，乾隆八年至十年是德馨堂本《文帝全書》較為可靠的成書時間。

而德馨堂本的主要編纂團體，是以劉樵為首的文人團體（包括劉樵的兒子劉天任和世侄劉占爵等人）²⁶ 以及金本存為首的文昌乩壇。刊刻的地點，當為貴州一帶。上文所引序跋中提及，全書刊刻於清江，即劉樵任職的清平縣。加諸其中稱金本存為「大定金翁」、稱俞文耀為「古州寓公」，兩者皆有貴州地名，基本也佐證了上述成書地點的結論。

另外，德馨堂本作為《文帝全書》的初本，其文本來源也是值得一提的。劉樵在乾隆八年的序言中明確說到，其來源有二，一是金本存所在乩壇的藏書，二是劉占爵家中的藏書。²⁷ 唯一的例外是卷一的〈帝君本傳〉，是由劉樵親自為《文帝全書》撰寫的。

2. 乾隆十一年憩園重刊本《文帝全書》（以下簡稱「憩園本」）：

事實上，筆者至今尚未見到這一版本，也未曾在館藏目錄中發現其蹤跡，疑似已經佚失。不過根據後來各版《文帝全書》的蛛絲馬跡，該版本《文帝全書》的存在乃是基本沒有爭議的事實。一方面，收錄有憩園重刊序跋的版本包括關本《文帝全書》（及其在道光二十五年的重刊本）、光緒二年重刊的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以及道光八年（1828）四川地區甘雨施增纂的《文昌帝君全書》（及

²⁵ 劉占爵稱：「壬戌叔滄亭纂刻《文帝全書》于清江，占爵幸得與讐校之列。叔命之跋，占爵以不敏謝。越三年，古州寓公驚峰俞先生，有重刊之舉，仍以讐校責之占爵，而命一言以附于末。蓋占爵從事讐校文帝之全書已再矣。」清·劉占爵，〈憩園重刊本跋〉，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五〇。

²⁶ 劉天任，劉樵之子，號蔭誠，一號清惠；劉占爵，劉樵世侄，非血親，號允誠，一號清虛；劉悟誠，本名不詳，劉樵之兄，一號又玄子；劉廣恕，本名不詳，身分不詳，一號惺源子。

²⁷ 劉樵稱：「大定金翁復陽，數年前曾識之清平，搜存帝君各種書極多。當余矢願纂編之日，正伊疏募刊布之時……貴陽小阮清虛，今春家不戒於火，所有盡歸灰燼。獨老僕挈一篋出，而帝君諸書如《化書》、《孝經》、大洞經咒諸善本，巍然獨存……爰取金翁及小阮家所藏者，彙輯為全書三十二卷，竝附桂宮羣真之著述而授之梓。因敘次帝君事實，作為本傳，冠之篇端。」清·劉樵，〈文帝全書序〉，氏編，《文帝全書》（清乾隆八年至十年刊本），卷首。

其重刊本）。三者並非在同一條文本傳遞鏈上（後詳，並參文末附圖），但都收有憩園重刊序。另一方面，據序跋中的內容所稱，俞文耀重刊的不僅僅是《文帝全書》，也包括同為劉樵編輯的《呂祖全書》。²⁸ 而憩園本的《呂祖全書》已經找到，見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²⁹ 因而絕對有理由相信，曾經存在過刊刻於乾隆十一年前後的憩園本《文帝全書》。

由於憩園本的實體已經不存，因此暫時很難有相關的一手資料來了解它的編纂團體和具體的文本情況。不過仍然可以從關本等文帝類全書所收錄的序跋中一窺其大概。事實上，憩園本的編纂團體，大體上承襲了德馨堂本的原班人馬。不僅德馨堂本的主要編纂人劉樵為憩園本作序，同為核心人物的劉占爵也為之作跋，並明確說明：「茲者鷺峰先生有事重梓，而占爵復得効讐校之力。」³⁰ 加諸劉樵、劉占爵二人都將俞文耀稱為「古州寓公」，因此，憩園本或許是俞文耀致仕後居於古州時，欣賞時任古州同知的劉樵所編的《呂祖全書》和《文帝全書》，進而出資襄助重刻，也就順理成章邀請原本出力頗多的劉占爵再任校讎工作。

3. 乾隆五十九年重刊本《文帝全書》（以下簡稱「蔣本」）：

該版《文帝全書》封面印有「乾隆甲寅年重刊」的字樣，因此推斷為乾隆五十九年的重刊本。其內容大致與德馨堂本無異，但排版不同，因此當為重新刻板，而非原板或翻印。它與德馨堂本的顯著區別有以下兩點：(1) 除了原來三篇序言之外，另外收入陳惠榮落款於乾隆十一年以及徐立御落款於乾隆十年的兩篇序。筆者推斷，當為德馨堂本在獲得高官贈序後又一度增印過，故而有乾隆十年和十一年的序言，該增印本很有可能成為乾隆五十九年重刊本的底本。(2) 雖說德馨堂本的封面寫有「附羣真著述」的字樣，但是在北大找到的藏本卻沒有《羣真著述》，似乎已經佚失，而在上海圖書館找到的蔣本為足本。考慮到關本採用了至少三種底本的緣故，蔣本的《羣真著述》可以暫時視為最接近原本的版本；而且它和關本所收相應文本幾乎沒有出入，考慮到兩者的刊印是相對獨立的，而

²⁸ 劉樵在〈憩園重刊本序〉中稱：「予于古州寓公俞君鷺峰，得予纂刻文帝、孚佑二帝君之全書而有異焉。」又稱：「鷺峰於二帝君全書之重付剞劂。」清·劉樵，〈憩園重刊本序〉，氏編，《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首。

²⁹ 清·劉樵編，《呂祖全書》（清乾隆十一年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³⁰ 清·劉占爵，〈憩園重刊本跋〉，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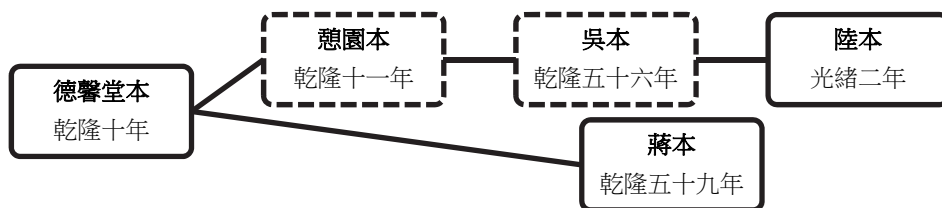
且考之蔣本的副文本，似乎並不知曉關本的存在，所以也有理由相信這就是《羣真著述》原本的文本面貌。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該版本所附的《羣真著述》後有一篇跋文，跋文本身的落款是嘉慶元年（1796），作者是吳門蔣源嶽。跋文稱，該版本是由蔣氏叔侄與黎石村等人共同謀劃、鳩資剞劂而成，出力最多的黎石村也在完成重刊工程的「甲寅夏」「竟因此隕厥」。³¹ 由此可以從中了解到，該版《文帝全書》確實是在乾隆五十九年完成刊刻。而嘉慶元年的跋文或許是後續刷印等過程中增刻加入的。

4. 光緒二年重刊本《文帝全書》（以下簡稱「陸本」）：

該版《文帝全書》的底本問題要更加撲朔迷離一些。除卻各個版本都收有的序言之外，光緒本還有以下幾類副文本：(1) 重刊者陸初望於光緒元年（1875）的重刊序；(2) 乾隆五十六年（1791）吳惠所作〈原序〉及其老師唐寓所作〈文帝全書募刻原引〉；(3) 憩園重刊本序。根據光緒元年的重刊序，可得知其底本購自書肆，為《文帝全書》和《武帝彙編》兩種合為一函；³² 再考該版《文帝全書》所附《武帝彙編》也收有吳惠作於辛亥年的一篇序言，推斷此辛亥年亦當為乾隆五十六年。由此推斷，陸本《文帝全書》的底本疑似為刊印於乾隆五十六年左右的《文帝全書》附《武帝彙編》（以下簡稱「吳本」），編者為吳惠等人，遺憾的是筆者並未能找到該版本抑或相關的館藏信息，因此只能暫時存疑，以待日後再考。而介於其收有憩園重刊本序言，如若真的存在這個乾隆五十六年本《文帝全書》，當為憩園重刊本之後的再次重刊罷。

綜上，三十二卷本之間的關係，大致可以如下表示：



初本《文帝全書》為三十二卷本，於乾隆七年左右開始刊刻，最遲至乾隆十年完

³¹ 清·蔣源嶽，〈重刊後跋〉，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卷末。

³² 清·陸初望，〈序〉，清·劉樵編，陸初望重刊，《文帝全書》（清光緒二年重刊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卷首。

成，因板藏德馨堂，而被後世稱為「德馨堂本」。緊跟著又於乾隆十一年，由原先編纂團體中的核心人物劉占爵負責、在俞文耀的支持下重刊一次，被稱為「憩園（重刊）本」，今似不存。大約在乾隆五十六年，吳惠牽頭將憩園本和新匯集的《武帝彙編》一同出版，今亦似不存。該版本在光緒初由陸初望等人再次重刊。而另一條重刊線路則未經過憩園本，是在乾隆五十九年，由蔣源嶽等人直接從德馨堂初本之重印本的基礎上重刊而成。

如今存世的相對完整的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主要是德馨堂本、蔣本和陸本。毫無疑問，德馨堂本的文獻價值最為突出，畢竟它保留了初本三十二卷本的原貌。不過北大藏本的缺陷在於佚失了附錄的《羣真著述》六種。而蔣本的文獻價值恰恰就是它完整保留了三十二卷以及附錄的全部內容。至於陸本的價值，一方面它是較晚重刊的版本，因此可以看出文本流傳期間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它保留了吳本在乾隆末期所收集的關帝文本，亦即《武帝彙編》，是關帝的扶乩文獻中較早的合集。

（三）三十二卷本收錄的文本

上文曾經提到，德馨堂本的主要文本來源有二，一為金本存所在的文昌乩壇，一為劉占爵的藏書。事實上，金本存所在的乩壇不僅搜羅文昌經典，同時也通過扶乩或筆籙產生出新的文昌文本。雖然如今無法區分傳世文本中哪些文本來自劉占爵的藏書、哪些來自金本存的藏書，但仍然可以很清楚地知曉哪些文本是由金本存的乩壇所產生的。

另一方面，學界也對明《道藏》中的文昌經有了一定的研究，³³ 因此可以從《文帝全書》中識別出部分在明《道藏》中已經收錄的文本。這些文本在全書中佔據不到四分之一的卷數。可見《文帝全書》中絕大部分文本，都來自於明《道藏》以外。

表二以乾隆五十九年的蔣本為基準，³⁴ 羅列了三十二卷本所收的文本，並列

³³ 明《道藏》中所收文昌經的相關研究，可參王興平，〈劉安勝與文昌經〉，王興平等，《中華文昌文化》，頁 315-324；丁培仁，〈明道藏有關文昌梓潼帝君文獻考述〉，《宗教學研究》2004.3：41-52；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1203-1210.

³⁴ 使用蔣本而非德馨堂本的原因，是因為北大藏德馨堂本並非全本，其所附《羣真著述》已經佚失。

胡勅辰

明該文本是否見收於明《道藏》，抑或產生於金本存的文昌乩壇。這兩者以外的其餘文本，基本上就產生自明《道藏》至德馨堂本刊刻的三百年間（1445-1745），在表二中以背景色標出。

表二：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所收文獻

序號	文獻名稱 （根據目錄）	卷數	明《道藏》中的相關文本	是否在金本存的 文昌乩壇中產生
01	文昌帝君本傳	內函卷 1	×	×
02	化書	內函卷 2-4	《梓潼帝君化書》(DZ170)	×
03	孝經新註	內函卷 5-6	×	×
04	大洞經示讀	內函卷 7-9	《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 (DZ5)、《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 洞仙經注》(DZ103)	√
05	本願經	內函卷 10	《元始天尊說梓潼帝君本願經》 (DZ29)	×
06	救劫經	內函卷 11	×	×
07	延嗣經	內函卷 12	×	×
08	聖訓	內函卷 13-14	內含《清河內傳》(DZ169)	部分
09	陰騭文句頌	內函卷 15	×	×
10	陰騭文註證	內函卷 16-19	×	×
11	丹桂籍	內函卷 20-23	×	×
12	戒士文徵信錄	內函卷 24	×	×
13	大洞吉祥神咒	外函卷 25	×	×
14	大洞紫陽寶籙	外函卷 26-28	《高上大洞文昌司祿紫陽寶籙》 (DZ1214)	×
15	治瘟寶籙	外函卷 29-30	×	√
16	集唐籤	外函卷 31	×	×
17	文帝聖誥	外函卷 32	×	×
18	羣真著述（玉局心 懺、躬行心懺、清 靜法要、清靜法 程、祿嗣祕訣、坤 寧妙經）	附錄	×	部分

根據劉樵的構想，卷一至卷二四（即表二 01-12）以「經」為形式的文本，屬於「儒」，而卷二五至三二（即表二 13-17）以符、籙、咒、法、籤、誥為形式的文本，屬「儒」的「教外別傳」。³⁵ 這一點一反傳統道經中以道為內、以儒釋等教為外的模式。顯然，劉樵並非是站在傳統道經編輯的立場上進行《文帝全書》的編纂和出版，而是有意識地建構起一種不同於早期文昌信仰性質的、作為「儒教正宗」的文昌帝君信仰內涵。而這一儒道內外之分，一直貫穿著《文帝全書》在整個有清一代的出版史。

以下進一步聚焦於《文帝全書》所收的文本。其中一部分雖是見於明《道藏》的經典，不過其與《道藏》本已有一定的差異：如《文帝全書》本《化書》，其底本為清刻本，向上可最終追溯至明萬曆年間的《文昌化書》刻本，其內容和《道藏》本存在相當的異文；³⁶ 又如《大洞經示讀》為針對過往《大洞仙經》而扶乩新出的「改良縮減本」，雖然文句仍與《道藏》本《大洞仙經》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反映的是金本存所在文昌乩壇的宗教訴求。³⁷ 以下先對《道藏》未收的文本進行最為簡單的介紹：

- (1)《文昌帝君本傳》：該文為劉樵根據《清河內傳》與《文昌化書》刪繁就簡折衷而成。
- (2)《孝經新註》：該文本是《文昌孝經》的註本。形成年代不詳，序跋落款分別題名為明朝中期名儒邱濬與王鏊，但是否出自歷史邱濬與歷史王鏊尚待考證。筆者暫時未見明版《文昌孝經》，所目見最早的《文昌孝經》刊本為乾隆三年刊《孝經新註》，³⁸ 疑似為《文帝全書》的底本。其與「十三經」中的《孝經》內容不同，全文共分六章，皆為四字句。
- (3)《救劫經》、《延嗣經》：兩經的成書年代不詳，前者存在明代刊本，但明

³⁵ 「自一卷起二十四卷止為『內函』，自二十五卷起至三十二卷止為『外函』。蓋帝君之教，以儒為主，而符咒之類，乃教外別傳，故分內外云」。清·劉樵，〈凡例〉，氏編，《文帝全書》（清乾隆八年至十年刊本），卷首。

³⁶ 異文可參謝政修，〈《文昌化書》研究〉，頁 190-197。

³⁷ 《大洞經示讀》的相關研究，可參 Kim Jihyu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s: With a Focus on Innovations in the Scripture of the Great Cavern in Ming-Qing Daoism,"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7 (2015): 63-115。明《道藏》本文昌大洞經的研究，可參石井昌子，〈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と上清大洞真經との關係〉，《創大アジア研究》6 (1985): 73-101。

³⁸ 清·湯萬煌註，《文昌孝經》（清乾隆三年刻本，京都：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清刊本之間存在一定的異文。³⁹ 雖然緊跟《本願經》之後，但疑似為明《道藏》之後才出現的文本，而非《道藏》失收。兩者內容皆以勸善為主題。

- (4)《聖訓》：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主要收錄《文帝全書》編纂以先就存在的勸善文或乩文，如〈陰騭文〉、〈勸敬字紙文〉、〈命彭定求宣示三條〉等；下卷則收錄了在金本存的鱣壇降乩的乩文以及過往諸版《化書》所附的勸善文和一些著名文人留下的〈文昌祠記〉等。
- (5)《陰騭文句頌》、《陰騭文註證》和《丹桂籍》都是《文昌帝君陰騭文》（簡稱《陰騭文》）這篇勸善文的不同註本，而《陰騭文》大約成書於明中後期，與成書於南宋的《太上感應篇》以及明清之際的《關聖帝君覺世經》並稱為「三聖經」，對明清以來的善書影響深遠。⁴⁰ 而此處所收的註本都是現存相對較早的版本，對後世的傳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 (6)《戒士文徵信錄》：該文本為《戒士子文》這篇勸善文的「徵信錄」，即靈驗紀聞。《戒士子文》亦是自明代便已經開始流行的勸善文，主要勸戒對象為儒生與士人。而該本《戒士文徵信錄》成書於清初，後也以《桂香鏡》之名單獨刊行。⁴¹
- (7)《大洞吉祥神咒》：該文本成書年代不詳。據劉樵〈小序〉，其底本為江夏楊啟明所刊定，後增附涵三宮所演諸咒，或為清初產生的文本。
- (8)《治瘟寶籙》：又稱《大洞治瘟金籙》，其中主要內容為針對疫病等災疾的符與籙。該文本或為劉占爵扶乩所得，證據就是金本存所編定的《文昌聖典》中，記載《治瘟寶籙》的緣起時曾提到：「壇主乃附筆於允誠劉生，閱八月而演錄始成。」⁴²

³⁹ 明·佚名，《梓潼帝君救劫寶章》（收入明·胡文煥編，《格致叢書》，明萬曆年間刻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明本《梓潼帝君救劫寶章》和清代諸版本《梓潼帝君救劫寶經》之間的異文問題，可參胡劼辰，〈《文昌帝君陰騭文》起源新研：以《為善陰騭》、《勸行陰騭文》以及《梓潼帝君救劫寶章》為中心〉，李世偉主編，《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十一）》（新北：博揚文化，2016），頁141-145。

⁴⁰ 酒井忠夫是較早考證出《陰騭文》成書於明代的學者，並將其成書下限定在萬曆至天啟年間，參酒井忠夫，〈陰騭文の成立について〉，《東方宗教》1957.7：1-13；酒井忠夫，《增補中国善書の研究》，頁509-544。最近，筆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陰騭文》成書的上限不早於永樂十七年，參胡劼辰，〈《文昌帝君陰騭文》起源新研〉，頁133-169。

⁴¹ 清·劉鑑編，《桂香鏡》（清道光十七年刻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⁴² 清·金本存編，王崑重刊，《文昌聖典》（清道光二年重刊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卷一三，《文昌敕演大洞治瘟寶籙補遺妙典》。

- (9)《集唐籤》、《文帝聖誥》：該兩種文獻出處亦不詳，或為當時流行的文本。《集唐籤》是由唐詩詩句所集的籤文；《文帝聖誥》則是文帝及其聖眷的寶誥。
- (10)《羣真著述》：包括《玉局心懺》、《躬行心懺》、《清靜法要》、《清靜法程》、《祿嗣祕訣》、《坤寧妙經》六種，其中既有金本存乩壇所演經文，也包括了其他乩壇中文帝座下仙真所降演的文本。由於該六種文獻的降乩者並非文昌帝君本尊，而是其下轄的仙真，故而劉樵將其編為附錄附在《文帝全書》之後。

以上便是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的概況。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在其基礎上增輯而成的五十卷本。

三·五十卷本《文帝全書》

五十卷本是《文帝全書》的第一個增輯本，完成於乾隆四十年（1775）。除此以外，根據祁泰履書中提供的線索，尚有道光年間的重刊本一種。以下內容主要針對兩種五十卷本《文帝全書》進行出版史的探討，並且將之與三十二卷本進行比較。

（一）已知版本的基本信息

1. 乾隆四十年本《文帝全書》（即「關本」）：

根據關本中的序跋大致可以了解到，關本的編纂主要有賴於三個核心人物，即負責出資的王世陞、負責統籌的蔡來鶴和負責校刊的關槐。⁴³ 關本的刊刻時間則沒有太多的疑問。蔡來鶴的跋文中明確指出，該書「基始於癸巳（1773）五月，而蒞事則甲午（1774）冬仲也」。⁴⁴ 加諸關本的大部分序言都落款於乾隆甲午，王世陞一序落款於乾隆乙未（1775），因此書刊成於乾隆三十九年，印行於乾隆四十年當無疑。或許印行的推遲是為了等待後行刊刻的《呂祖全書》一同印成。⁴⁵

⁴³ 王世陞，字履階，號雲軒。蔡來鶴，吳門羽士，時於西湖南面結廬而居，名天香閣，與王世陞同為惜字團體「桂香集」的成員。關槐，字柱生，或為蔡來鶴的俗家弟子。

⁴⁴ 清·蔡來鶴，〈文帝全書後跋〉，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五〇。

⁴⁵ 蔡來鶴在《呂祖全書》的跋文中稱：「爰開雕於甲午八月，而蒞事則乙未七月也。」由此

根據關本的凡例內容同樣可以知曉其編纂的底本信息。其最為主要的底本有三，分別是德馨堂本、憩園本和朱珪所編纂的《文帝書鈔》。關槐在凡例中如是說：「是書德馨堂纂刻後，憩園俞氏重梓於古州，又大興朱氏石君，校刊內函數種，為《文帝書鈔》十四卷，其中間有是正劉本者，今從之。」⁴⁶ 也就是說，雖然憩園本和《文帝書鈔》都是在德馨堂本的基礎上刊刻而成，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異文——尤其是關槐認為《文帝書鈔》更正了德馨堂本的一些訛誤，故而關本也採納了其中的修正部分。除此以外，關槐也使用其他單行本對個別文本進行增刪損益，並且還增加部分文本，下詳。

2. 道光二十五年本《文帝全書》（以下稱為「蔡本」）：

就已有的資料顯示，關本編成後曾重刊過一次，即道光二十五年（1845）於廣東地區由蔡傑主導重刊。如今大英圖書館有一套藏本。

在蔡傑所撰寫的序言中，明確指出該重刊本的底本即為關本：「《文帝全書》垂訓世人久矣，始於乾隆癸亥義陵劉氏彙輯內函外函三十二卷，乾隆甲午仁和關氏復增輯之共五十卷。」⁴⁷ 重刊之事由蔡傑在道光二十五年發起，他在序言中稱：「道光乙巳，館於廣州城西湄洲文帝廟後，座與一二同志談及此書，議將關氏增輯原本勸助重刊，其板藏在本廟……不數月而功告成。」⁴⁸ 而大英圖書館該藏本的封面，也確實印有「粵東省城西關湄洲二帝廟內藏板刷印」的字樣，可與序言內容相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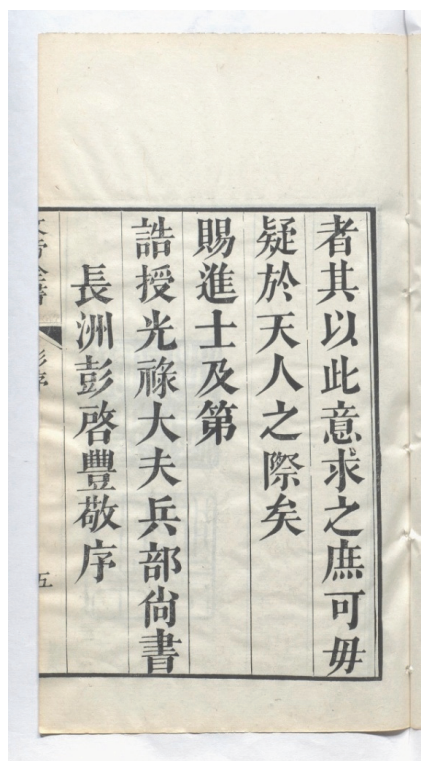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增加一篇蔡傑所寫的序言、並刪去王世陞的序言之外，蔡本基本完全是以關本為底本翻刻而成，無論是內容還是文字樣式與排版，都沒有顯著的變化。如圖二所示：

可知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的完成時間是乾隆四十年，比《文帝全書》略晚。參清·蔡來鶴，〈呂祖全書靜一子重梓後跋〉，清·劉樵編，邵志琳增訂，《呂祖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卷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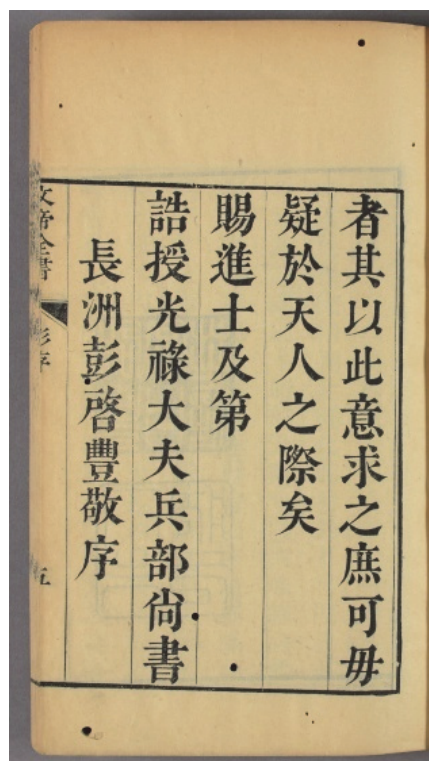
⁴⁶ 清·關槐，〈凡例〉，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首。

⁴⁷ 清·蔡傑，〈序〉，清·劉樵，〈文帝全書〉（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卷首。

⁴⁸ 清·蔡傑，〈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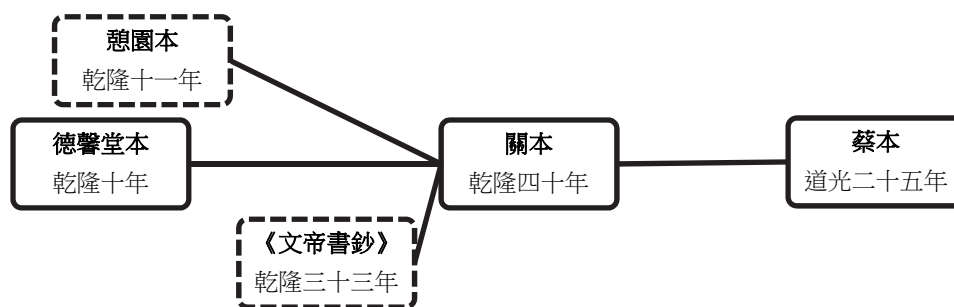
道光二十五年蔡本



乾隆四十年關本

圖二

根據以上分析，大致能夠刻畫出三十二卷本到五十卷本的版本流傳變化，如下所示：



初本《文帝全書》成書後，分別於乾隆十一年和三十二年產生了懋園重刊本和朱珪節選編輯的《文帝書鈔》，三者共同構成了乾隆四十年五十卷本（即「關本」）的主要底本，後者又於道光二十五年於廣東湄洲獲得翻刻。

(二) 五十卷本收錄的文本

五十卷本《文帝全書》最大的文本來源就是三十二卷本，並且在此基礎上增加部分文本。簡而言之，兩者主要差異有如下幾點：(1) 五十卷本仍然保留三十二卷本內、外函的分法，不過將三十二卷本附錄中的《羣真著述》拆分，加入外函之中；(2) 增加新文本數種；(3) 對於三十二卷中的個別文本，根據新材料擴充為一卷，抑或從一卷裂為兩卷；(4) 對個別文本進行重新分卷。

五十卷本所收錄的文本詳如表三，以早稻田大學所藏關本為基準。與三十二卷本不同的部分以背景色標出：

表三：五十卷本《文帝全書》所收文獻及比較

序號	文獻名稱	卷數	與三十二卷本的關係
01	本傳	內函卷 1	相同 ⁴⁹
02	化書	內函卷 2-3	相同
03	忠經	內函卷 4	新增
04	孝經新註	內函卷 5-6	相同
05	大洞經示讀註釋	內函卷 7-9	相同
06	本願經	內函卷 10	相同
07	救劫經	內函卷 11	相同
08	延嗣經	內函卷 12	相同
09	應驗經	內函卷 13	新增
10	聖訓	內函卷 14-16	有新增內容
11	陰騭文句頌	內函卷 17	相同
12	陰騭文註證	內函卷 18-21	相同
13	丹桂籍註案	內函卷 22-25	相同
14	蕉窗十則註解	內函卷 26-27	有新增內容
15	戒土文徵信錄	內函卷 28-29	從一卷分為兩卷
16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內函卷 30	有新增內容
17	大洞吉祥神咒	外函卷 31	相同

⁴⁹ 此處所謂「相同」是指宏觀層面上基本一致，但個別文本仍存在異文，甚至於有意識的增刪。這些文本細節的分析，本文不作深入探討，留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序號	文獻名稱	卷數	與三十二卷本的關係
18	開心神咒註釋	外函卷 32	有新增內容
19	大洞紫陽寶籙	外函卷 33-35	相同
20	大洞治瘟寶籙	外函卷 36-37	相同
21	玉局心懺	外函卷 38	從《羣真著述》編入外函
22	躬行心懺	外函卷 39	從《羣真著述》編入外函
23	文昌心懺	外函卷 40	新增
24	克治清靜法要	外函卷 41	從《羣真著述》編入外函
25	克治清靜法程	外函卷 42	從《羣真著述》編入外函
26	祿嗣祕訣	外函卷 43	從《羣真著述》編入外函
27	坤寧經箋注	外函卷 44-45	從《羣真著述》編入外函
28	質神錄	外函卷 46-47	新增
29	聖誥	外函卷 48	重新分卷，並有新增內容
30	聖眷誥	外函卷 49	
31	羣真誥	外函卷 50	
32	附錄藝文	附錄	《集唐籤》與其餘新增內容

如果將表三與表二進行比較，確實可以發現，五十卷本基本延續了三十二卷本的結構，最大的變化是將原先附錄的《羣真著述》六種拆入外函，按關槐在凡例中的說法，是因為「《羣真著述》，固全書之支流苗裔，不必別為標目」。⁵⁰另外則將《集唐籤》與其餘傳世的藝文做成附錄，附於五十卷之後。除此以外，便是個別文本的增刪損益，以及新文本的加入。

關本完全新增的文本，在表三中以粗體字表示，包括《忠經》、《應驗經》、《文昌心懺》以及《質神錄》。凡例中相應地提到：(1)「《勸忠》四章，得之四明萬近蓬先生福，增入內函為一卷」。(2)「《應驗經》劉云惜未抄存，俟他日補編。今據《經懺彙函》錄入為一卷」。(3)「《文昌心懺》，金氏萬全校刊於苕溪，其附梓真言各條，均玉局懺本所有，謹節之，合劉本心懺二種，並登外函」。(4)「《質神錄》，近得之長洲彭允初先生……謹登外函為二卷」。⁵¹也就

⁵⁰ 清·關槐，〈凡例〉，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首。

⁵¹ 以上四則，出自清·關槐，〈凡例〉，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首。

是說，其中三者分別來自萬福、金萬全和彭紹升，而《應驗經》所據的《經懺彙函》，似乎今已不存，暫無從考據。

這四種文本的大致內容，簡介如下：

- (1)《勸忠》全稱《文昌教忠勵世經》，簡稱《文昌忠經》或《忠經》，成立年代不詳，全書本有雍正十二年的乩序。關槐將之置於《文昌孝經》之前，毫無疑問是將兩者視為互補的一組文獻，是以「忠」為主題的勸善書。
- (2)《應驗經》雖不見於三十二卷本，卻其來已久，如今最早可追溯至明《道藏》本，全稱《元始天尊說梓潼帝君應驗經》(DZ28)，與《本願經》同為早期文昌經。
- (3)《文昌心懺》成於乾隆三十四年，與更早產生的《玉局心懺》同為杜真官所降示，當時應該暫只流行於江南地區。
- (4)《質神錄》成書時間更晚，於乾隆三十八年由彭紹升編輯而成，其最大的價值在於它保留了彭紹升的曾祖父彭定求早期乩壇活動的一手資料。⁵²

除此以外，還有部分文本雖然已見收於三十二卷本，但五十卷本使用新的底本進行損益。如五十卷本的《聖訓》部分，增加諸如《帝君教孝文》、《孝仙一炁論》之類的勸善文，也增加一些新的乩示。而三十二卷本的《聖訓》中，原先收有《蕉窗十則》和《慾海迴狂寶訓》這兩則乩示的勸善文，但五十卷本則將內容進一步擴充，使用了閔鼎玉的《蕉窗十則註解》以及邵志琳彙註的《慾海迴狂寶訓集說》。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開心神咒》上。根據關本的凡例：「開心咒，劉本編入《躬行心懺》，今得張氏世榮註釋本，別為一卷。」⁵³

最後剩下的一類變化，則是重新分卷。如「劉本《戒士文徵信錄》止一卷，今因卷帙繁重，分上下二卷」。⁵⁴又如全書最後部分的誥文，也經歷了重新分卷：「《聖眷誥》，劉本附《聖誥》後為一卷，今分二卷，真人王、熊、陳、費四誥，劉附《聖眷誥》後，今謹據《梓潼真經》、《文昌寶誥錄》，增輯《群真誥》，別為一卷，四誥併入卷內。」⁵⁵

⁵² 關於清代長洲彭家的扶乩和出版活動，可參 Daniel Burton-Rose, "A Prolific Spirit: Peng Dingqiu's Posthumous Career on the Spirit Altar, 1720-1906,"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7 (2015): 7-62; "Terrestrial Reward as Divine Recompense: The Self-fashioned Piety of the Peng Lineage of Suzhou, 1650-187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2016)。

⁵³ 清·關槐，〈凡例〉，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首。

⁵⁴ 清·關槐，〈凡例〉。

⁵⁵ 清·關槐，〈凡例〉。

以上便是五十卷本《文帝全書》的概況。接下來要介紹的三十八卷本《文帝全書》兩種，它們對於三十二卷本的改動，要遠遠小於五十卷本。

四·三十八卷本《文帝全書》

三十八卷本《文帝全書》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嘉道年間新出的文昌文本，共計六卷。就已知情況，現存三十八卷本《文帝全書》共兩種，分別是湖南省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本《文帝全書增纂》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同治八年（1869）本《文帝全書》。

（一）已知版本的基本信息

1. 道光二十七年本《文帝全書增纂》（以下簡稱「楚鄂本」）：

該版本的成書時間和背景相對比較清晰。該書的封面和內文落款皆為道光丁未年，所以基本可以判斷為該年前後成書。而該版的新增凡例中，特別指出：「是役始於道光丙午初夏，成於戊申仲春，凡兩經寒暑。」所以更嚴謹的推斷應當是，道光丁未年為開雕時間，而完全成書印行其實要等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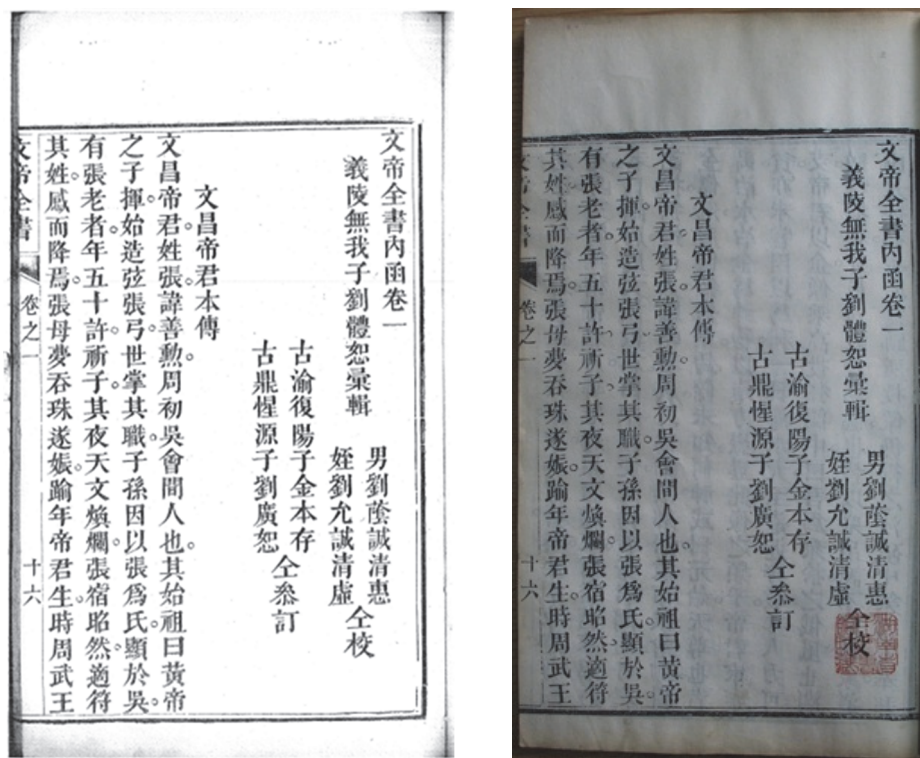
不過遺憾的是，該書的編纂團體以及主要發起人暫時不得而知。唯一一篇重刊時新增的序言，落款作者只說是「楚鄂弟子」，⁵⁶ 所以唯一的信息是該版本刊行於兩湖地區。

相比之下，該版本的底本源流則要清晰得多。該版本凡例共計十七條，前十四條完全承襲自三十二卷本，最後三條被特別標示為「重刊增纂凡例三則」。根據其內容可知，⁵⁷ 該三十八卷本即是在三十二卷本的基礎上，在內函中新增入六卷文本而成，幾乎完全保留了三十二卷本的結構——無論是內、外函，還是附錄其後的《羣真著述》，都保持以原先的狀態。

⁵⁶ 清·楚鄂弟子，〈文帝全書重刊序〉，清·劉樵編，楚鄂同人增訂，《文帝全書增纂》，（清道光二十七年刊本，長沙：湖南省圖書館藏），卷首。

⁵⁷ 凡例中稱：「新纂《親解》一卷、《道岸齊登》一卷，係近年帝君降筆所作，又顧南琴先生《制藝》三卷，程鶴樵中丞《試帖詩》一卷，久已傳播殆遍，復經裕魯山先生守武昌時頒發各學。茲特將此六卷纂入『內函』之中，連『外函』總計三十八卷，仍以《羣真著述》六冊附後。」清·楚鄂弟子，〈凡例〉，清·劉樵，《文帝全書增纂》。

通過比較，不僅能夠判斷出楚鄂本的底本是三十二卷本，甚至能夠分辨出，該底本與乾隆五十九年的蔣本是同一版本。通過文字和排版比較，可以看出，楚鄂本使用的是和蔣本同樣的版本翻刻而成：



乾隆五十九年蔣本

道光二十七年楚鄂本

圖三

另外，楚鄂本的新增凡例中還提供一則信息，即「此書底本購之黔省，其原板筆畫刊刻精工，因就板翻刻，惟查文內『玄』字皆加立人作『佺』」。⁵⁸ 以「佺」字代替「玄」字來避諱，確實是蔣本所使用的方法，且相比之下，更早的德馨堂本則是用缺筆來避諱。而楚鄂本所收錄的副文本，也與蔣本高度一致。由此基本可以斷定，楚鄂本的底本和蔣本是同一版本。

⁵⁸ 清·楚鄂弟子，〈凡例〉。

至於楚鄂本和蔣本的主要區別，即上文提到的新增文本四種六卷，分別是《陰隲文親解》一卷、《道岸齊登》一卷、《陰隲文制藝》三卷、《陰隲文試帖》一卷。

2. 同治八年本《文帝全書》（以下簡稱「聚鶴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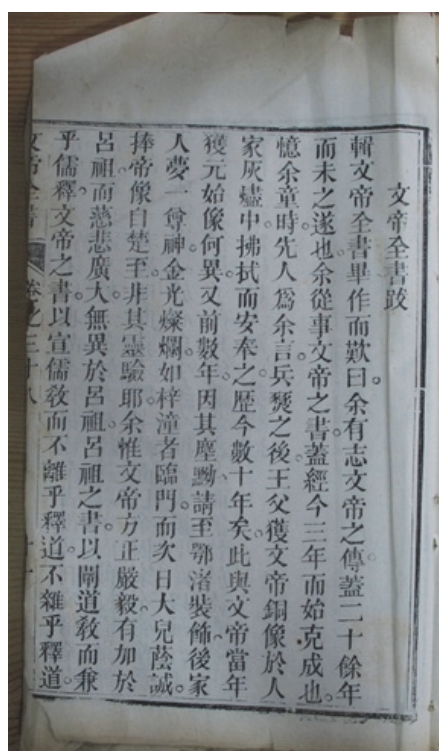
該版本的基本情況也比較清楚。封面上印有「同治己巳重刊」的字樣，並且伴隨重刊的三篇序跋，落款都是同治八年，當為此時成書無疑。序跋中說明刊刻時間和背景的信息不多，只有「包山道士」降乩的跋文中略有提及：「戊年乘香至鄂，偶遇諸子以奉香之儀相待，幸得名教諸尊同窗磨礪二三子，尚有造就，留連載餘，始有復刊全書之舉。」⁵⁹ 因此大致可以推斷是兩湖地區的乩壇成員於同治八年重刊該版《文帝全書》。由於重刊序中有一篇名為「聚鶴樓公序」，且落款為聚鶴樓弟子，所以聚鶴樓可能是他們乩壇或者乩壇所在地的名字。

至於該版本的底本，應當就是上述的楚鄂本無疑。理由如下：(1) 聚鶴樓本除了新增了三則同治八年的序跋外，其餘收錄的副文本與楚鄂本一致，當然也包括楚鄂本的道光二十七年序。(2) 〈聚鶴樓公序〉中稱：「敬思《文帝全書》緝從南省，夙稱玉簡瓊編，刊自鄂城，久已家絃戶誦。」⁶⁰ 明確指出他們所使用的底本是在鄂城刊刻的。而楚鄂本又恰恰是三十八卷本的最早版本。(3) 最重要的一點，當然還是聚鶴樓本和楚鄂本的文字及版式高度一致，當為翻刻本：

⁵⁹ 清·包山道士，〈跋文〉，清·劉樵編，楚鄂同人增訂，聚鶴樓弟子重刊，《文帝全書》（清同治八年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首。

⁶⁰ 清·聚鶴樓弟子，〈聚鶴樓公序〉，清·劉樵，《文帝全書》（清同治八年刊本），卷首。

胡劼辰



道光二十七年楚鄂本



同治八年聚鶴樓本

圖四

綜上，基本也能描繪出三十八卷本的文本流傳過程，如下所示：



初本《文帝全書》成書後，於乾隆五十九年重刊。其中一部（或其重印本、翻印本）傳播至貴州地區，道光末被「楚鄂弟子」一眾購得，翻刻並增入新文本四種六卷，成為了第一部三十八卷本《文帝全書》。不久以後又被聚鶴樓乩壇信眾購得，於同治八年翻刻。

（二）三十八卷本收錄的文本

上文多次提及，三十八卷本只是在三十二卷本的基礎上增加了新文本四種六卷，現列表比較如下，新增文本以背景色標出：

表四：三十八卷本《文帝全書》所收文獻及比較

序號	文獻名稱	三十八卷本中的卷數	對應三十二卷本的卷數
01	文昌帝君本傳	內函卷 1	內函卷 1
02	化書	內函卷 2-4	內函卷 2-4
03	孝經新註	內函卷 5-6	內函卷 5-6
04	大洞經示讀	內函卷 7-9	內函卷 7-9
05	本願經	內函卷 10	內函卷 10
06	救劫經	內函卷 11	內函卷 11
07	延嗣經	內函卷 12	內函卷 12
08	聖訓	內函卷 13-14	內函卷 13-14
09	陰騭文句頌	內函卷 15	內函卷 15
10	陰騭文註證	內函卷 16-19	內函卷 16-19
11	丹桂籍	內函卷 20-23	內函卷 20-23
12	戒土文徵信錄	內函卷 24	內函卷 24
13	陰騭文親解	內函卷 25	未收
14	道岸齊登	內函卷 26	未收
15	陰騭文制藝	內函卷 27-29	未收
16	陰騭文試帖	內函卷 30	未收
17	大洞吉祥神咒	外函卷 31	外函卷 25
18	大洞紫陽寶籙	外函卷 32-34	外函卷 26-28
19	治瘟寶籙	外函卷 35-36	外函卷 29-30
20	集唐籤	外函卷 37	外函卷 31
21	文帝聖誥	外函卷 38	外函卷 32
22	羣真著述	附錄	附錄

以下主要簡單介紹新增的四種文本。《陰騭文親解》和《道岸齊登》同為文昌帝君降乩的文本。前者所謂「親解」，是指文帝以降乩的方式對《文昌帝君陰騭文》進行逐句的註解。《道岸齊登》則分上下兩集，分別是以「勸」和「戒」為主題的善書。兩者大約成書於道光二十年前後，出自湖北地區同一個扶乩團

胡劼辰

體，該團體以鄂城張大沼家族及其友人為中心，跋文中記錄了乩壇和文本在道光年間誕生的經過。而《陰隲文制藝》和《陰隲文試帖》，則分別是顧南琴和程鶴樵的作品，是以《文昌帝君陰隲文》中的文句為題所作的八股文文集，主要在道光以後流傳於舉子士人之間。考慮到以上四種文本都有具名的創作者，暫無證據表明他們與刊刻三十八卷本《文帝全書》的「楚鄂弟子」是同一團體。

五・《文帝書鈔》

《文帝書鈔》的成書信息相對清晰。如今存世的多個版本的《文帝書鈔》中都收錄有朱珪落款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序言一則。而且不止一個版本的《文帝全書》曾提到《文帝書鈔》，如關本的凡例中就說：「是書德馨堂纂刻後，憩園俞氏重梓於古州，又大興朱氏石君，校刊內函數種，為《文帝書鈔》十四卷。」⁶¹ 且關本還收錄了〈朱氏書鈔序〉一則。又如嘉慶年間刊行的節錄本《文帝全書》的編纂者沈恒也在序言稱該書是「仿朱石君師所刻《文帝書鈔》之例」。⁶² 因此，雖然學界尚未發現初本的《文帝書鈔》，但其成書於朱珪之手，且成書時間不早於序言的乾隆三十三年、不晚於關本成書的乾隆四十年當無疑。

（一）已知版本的基本信息

雖然說《文帝書鈔》當成書於乾隆三十三年左右，但如今已知最早的存世版本是乾隆六十年（1795）的翻刻本一種。此外，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藏有嘉慶十五年（1810）左右刊刻的《帝君書鈔》一種，實為《文帝書鈔》的節選本。東京都立圖書館和早稻田大學則分別藏有同治十二年（1873）和光緒八年（1882）的重刊本各一種。⁶³ 以下部分，便從這些存世的版本入手，探究《文帝書鈔》的出版史。

1. 乾隆六十年翻刻本《文帝書鈔》：

該版本《文帝書鈔》雖不是初本，但在其重刊跋文中，跋文作者暨重刊人高

⁶¹ 清・關槐，〈凡例〉，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首。

⁶² 清・沈恒，〈序〉，清・劉樵編，沈恒選，〈《文帝全書》〉（疑似清嘉慶年間刊本，東京：東京都立圖書館藏），卷首。

⁶³ 除此以外，拍賣市場上曾出現道光二十九年和咸豐十年刊本各一種。

凌雲指出該版本實為翻刻本，⁶⁴ 因此相對完整地保留了初本《文帝書鈔》中的副文本，也是如今存世的最早版本。雖然關本《文帝全書》收錄了〈朱氏書鈔序〉一則，但該則序言有落款人「大興朱珪」，卻無落款時間。而該翻刻本《文帝書鈔》不僅收錄了朱珪的序與後序各一則，⁶⁵ 而且也有完整的落款時間，分別為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⁶⁶ 因此暫時是藉以分析初本《文帝書鈔》最重要的底本。

根據該翻刻本所收錄的朱珪的序言大致可以還原出初本《文帝書鈔》的成書背景。⁶⁷ (1)《文帝書鈔》編纂的時間背景是朱珪於「丁亥」年「司臬楚北」，考之《清史稿》，當為朱珪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補湖北按察使期間。⁶⁸ (2)《文帝書鈔》的底本，為劉樵編纂的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⁶⁹ (3)《文帝書鈔》只收錄了《文帝全書》中內函二十四卷的部分，並重新整合為十四卷。

至於初本《文帝書鈔》在乾隆六十年的這次翻刻，能夠知曉的具體信息並不多。翻刻者高凌雲在落款中自稱為「山西陽曲縣生員」，⁷⁰ 這幾乎是如今對高氏的唯一認識了。至於翻刻的目的，高氏在跋文中稱：「（《文帝書鈔》）乃相沿日久，字跡模糊，凌雲恪奉帝訓，遵循已久，惟期勸戒之仁，流而不息，推而彌廣。於是勉力翻刻，以公同好，非敢藉此以邀功也。」⁷¹ 所以似乎並沒有對原本進行任何大的改動。

⁶⁴ 跋文中稱：「於是勉力翻刻，以公同好。」清·高凌雲，〈跋文〉，清·朱珪編，高凌雲重刊，《文帝書鈔》（清乾隆六十年刊本，筆者私藏），卷尾。

⁶⁵ 朱珪的兩篇副文本並沒有標題。雖然朱珪在第二篇的落款中使用的是「大興朱珪跋」，但各個版本的《文帝書鈔》於該文的版心處皆標為「後序」，因此本文也以「後序」代稱。

⁶⁶ 清·朱珪，〈序〉，氏編，《文帝書鈔》（清乾隆六十年刊本），卷首；〈後序〉，同書卷尾。

⁶⁷ 朱珪在序言中稱：「丁亥司臬楚北，友人為予借得《文帝全書》三十二卷，蓋淑浦劉體恕所刻也。書分內外函，皆朱字，半隱見。竟卷讀之，如游包山、觀禹書矣。於是益激發夙志，思刷其積愆，而公善於同好。以『外函』多篆籀，不及鈔，乃擇鈔『內函』二十四卷，為十四卷，刻之以廣其傳。」清·朱珪，《文帝書鈔》（清乾隆六十年刊本），卷首。

⁶⁸ 清·趙爾巽等編，《清史稿》（民國十七年清史館本），卷三四〇，〈列傳一百二十七〉。

⁶⁹ 不過朱珪稱其所用的底本通篇朱字，暫時未見。

⁷⁰ 清·高凌雲，〈跋文〉。

⁷¹ 清·高凌雲，〈跋文〉。

2. 同治十二年重刊本《文帝書鈔》：

該版本的底本並非初本《文帝書鈔》。重刊者葛慶同和馬錫奎在同治十二年的序言中說到：「中丞《書鈔》一刻，始于乾隆三十三年，後二十餘年，五台李君復有重刻之舉，今又近百年矣。」⁷² 加諸該版還收錄有李永恆於乾隆五十七年所寫的重刊序，由此可知，同治本的底本是乾隆五十七年的一個重刊本，該版本至今未能得見。

3. 光緒八年重刊本《文帝書鈔》：

該版本重刊的時間得自於封面所印的「光緒壬午年荷月」的字樣。書中沒有收錄與該次重刊有關的任何信息。除了收錄有朱珪於乾隆三十三年所寫的序和後序以外，與同治本一樣也收錄了李永恆的序文。除此以外，光緒本還收錄了一則范元德於嘉慶九年所寫的序言。因此，光緒本疑似以范元德的重刊本為底本，暫不得而知。關於三個版本的《文帝書鈔》所收錄的副文本，可參表五：

表五：各版本《文帝書鈔》所收副文本

副文本	乾隆六十年本	同治十二年本	光緒八年本
朱珪 乾隆三十三年序	○	○	○
朱珪 乾隆三十三年後序	○	○	○
李永恆 乾隆五十七年序		○	○
高凌雲 乾隆六十年跋	○		
范元德 嘉慶九年序			○
葛慶同、馬錫奎 同治十二年序		○	

由此推斷同治本和光緒本都可以追溯至李永恆重刊的乾隆五十七年本，而乾隆六十年本的翻刻本則直接出自朱珪原本，屬於兩條文本傳遞鏈。通過具體的文本比較，同治本和光緒本幾乎完全一致，與乾隆六十年本也非常相似，只是排版上往後推移了一行：

⁷² 清·葛慶同、馬錫奎，〈重刻文帝書鈔序〉，清·朱珪編，葛慶同、馬錫奎重刊，《文帝書鈔》（清同治十二年刊本，東京：東京都立圖書館藏），卷首。



乾隆六十年本

同治十二年本

光緒八年本

圖五

從圖五中可以看出，同治本和光緒本刻字風格不同，但內容和排版完全一致。乾隆六十年本第十三、十四卷所收文本的篇名為「陰騭文註」，而同治本和光緒本則為「陰騭文徵驗錄」，或是因為跟隨李永恆刊本的緣故。另外，同治本和光緒本在每卷標題後的落款處，將「大興朱珪石君敬輯」改為「大興朱 珪石君校」，並增加「五臺李永恆壽山刻」的字樣，因此整體內容相較乾隆六十年本要往後順延一行，但每行字數和內容仍然一樣。如果進一步比較三個版本所收錄的朱珪序的話，會發現幾乎完全一致：

胡劫辰



乾隆六十年本

同治十二年本

光緒八年本

圖六

尤其是同治本，其序言的文字風格和行距與之前圖中的並不一致，反而和其餘兩個版本的序言更為接近。由此，朱珪的序言或許在這幾條文本傳遞鏈的過程中被反覆翻刻，卻未曾重刻。而同治本和光緒本中所收錄的李永恆序言，有雙抬和挪抬的現象，與朱珪的序言及正文內容均不同，因此可以推斷李氏在重刊時並未對原文作重新的排版。由此，加上三者正文部分的内容高度一致，基本可以斷定，以上三個版本的《文帝全書》的朱珪序言和正文内容基本保留了朱珪原本的面貌。也就是說，《文帝書鈔》並未在整個流傳過程中發生大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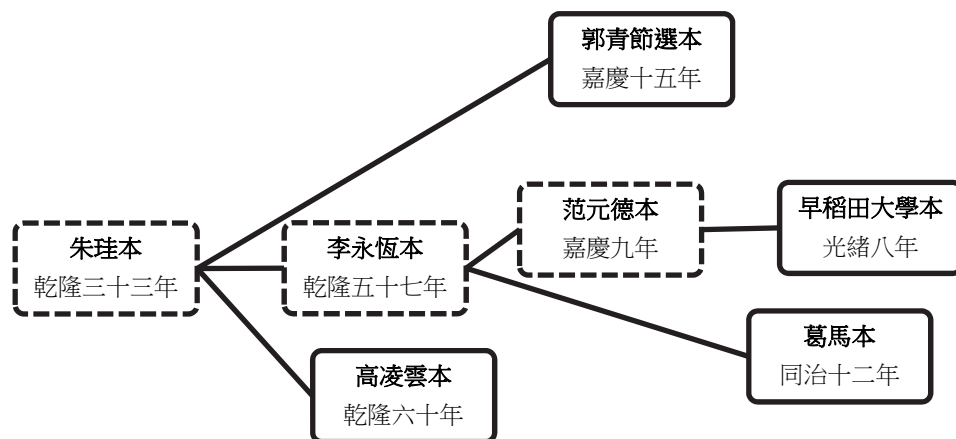
4. 嘉慶十五年節選本《帝君書鈔》：

該版本封面標題為「帝君書鈔」而非「文帝書鈔」，不過其封面右側還印有「大興朱石君原本」字樣，也收錄了朱珪在《文帝書鈔》中所寫的序言。考察內容的話，則發現該書並非全本《文帝書鈔》，而只保留了《陰騭文註》。

該版本的刊刻信息，主要保留在刊印者郭青所撰寫的序言中。郭青稱：「青於己巳歲，客粵東陳廉使望坡官署，見張友國瑞從四川携來鈔本……故將鈔本付梓，

以廣其傳。」⁷³ 由此可知，該版本是於粵東刊印。不過郭青隻字未提他所見的鈔本究竟是上文所介紹的全本十四卷，抑或已經是只剩下《陰騭文註》的節錄本了。

綜上，《文帝書鈔》各已知版本的文本傳遞鏈可以歸結如下：



（二）與《文帝全書》的比較

接下來將針對《文帝書鈔》和《文帝全書》進行比較研究。由於上文已經說明，足本的《文帝書鈔》之間存在的版本差異不大，因此以下的比較選取乾隆六十年的翻刻本《文帝書鈔》作為底本，比較的對象則是作為《文帝書鈔》成書之底本的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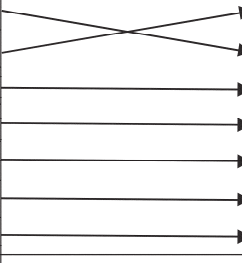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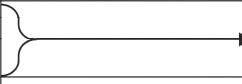
上文曾提及，《文帝書鈔》是「擇鈔『內函』二十四卷，為十四卷」，⁷⁴ 因此並未包含《文帝全書》外函的內容。根據朱珪所撰後序可以得知，將內函二十四卷整合為十四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一是將《陰騭文》相關部分整合成為兩卷，二是在其餘部分中提取出十二卷。⁷⁵ 而通過目錄的比較，具體情況詳如表六：

⁷³ 清·郭青，〈序言〉，氏編，《帝君書鈔》（清嘉慶十五年刊本，倫敦：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藏），卷首。

⁷⁴ 清·朱珪，〈序〉，氏編，《文帝書鈔》（清乾隆六十年刊本）。

⁷⁵ 朱珪稱：「珪既擇鈔劉子體恕所刻《文帝全書》得十二卷，又取其中潘仲謀《陰騭文註證》、顏生愉《丹桂籍註案》，合而輯之，成二卷。所錄故事，欲其簡切著明，足以興感激發人之善心，往往隨手刪潤，不及詳考，覽者得其意可也。」清·朱珪，〈後序〉，氏編，《文帝書鈔》（清乾隆六十年刊本）。

表六：《文帝全書》與《文帝書鈔》收錄文本比較

三十二卷本內函部分		《文帝書鈔》	變化
文昌帝君本傳（1卷）	刪去	文帝世紀	新增
化書（3卷）		孝經（1卷）	刪去註釋
孝經新註（2卷）		化書（3卷）	
大洞經示讀（3卷）		大洞經示讀（3卷）	
本願經（1卷）		本願經（1卷）	
救劫經（1卷）		救劫經（1卷）	
延嗣經（1卷）		延嗣經（1卷）	
聖訓（2卷）		聖訓（2卷）	
陰隲文句頌（1卷）	刪去		
陰隲文註證（4卷）		陰隲文註（2卷）	將註證內容刪減潤色
丹桂籍註案（4卷）			
戒土文徵信錄（1卷）	刪去		

相比《文帝全書》的內函，《文帝書鈔》所作出的變動要比朱珪在序言中提到的還更多，主要包括以下幾點：(1) 將劉樵所撰寫的《文昌帝君本傳》刪去，代之以朱珪自己撰寫的《文帝世紀》，並併入卷首，而非單獨列為一卷。(2) 將《孝經新註》中的註釋全部刪去，只保留《孝經》（即《文昌孝經》）的經文部分，並提到《化書》之前，冠之於卷一。(3) 刪去《陰隲文句頌》，並將《陰隲文註證》和《丹桂籍註案》共計八卷合併縮減為朱珪自己編寫的《陰隲文註》二卷。(4) 刪去《戒土文徵信錄》。

雖然朱珪在序言中明確表示，此書是抄錄自劉樵所編《文帝全書》，但毫無疑問的是，朱珪的做法已經不單單是節錄該書，而是在此基礎上融入自己的認識，並試圖取代劉樵的編輯風格。這從他將《文帝全書》的所有序言以及劉樵撰寫的《文昌帝君本傳》盡數刪去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到。

朱珪對待《孝經》的態度也是值得探究的。在《文帝書鈔》的序言，他指出文昌帝君「降自恒宿，歸神紫垣，歷十七世、九十七化，至於無極。然皆本之忠孝，而以為善誘天下萬世……」⁷⁶ 而在他為沈恒節錄本《文帝全書》所撰寫的序言，朱珪也再一次提到文昌帝君是「本忠孝以善誘天下」。⁷⁷ 可見，朱珪在編輯《文帝書鈔》時，想要提倡和表達的對文昌帝君的認識，是基於忠孝之道的，這

⁷⁶ 清·朱珪，〈序〉，氏編，《文帝書鈔》（清乾隆六十年刊本）。

⁷⁷ 清·朱珪，〈序〉，清·劉樵，《文帝全書》（疑似清嘉慶年間刊本），卷首。

也符合朱珪作為高級翰林的儒生意趣。他比之劉樵更進一步的，是將《孝經》冠為整部《文帝書鈔》之首，而將《孝經》視作文帝啟示的第一經，取代了作為早期文昌經代表的《化書》的最高地位，這在之前是從所未有的。

朱珪將《陰騭文註證》和《丹桂籍註案》刪改潤色並且合併成《陰騭文註》的過程中，除了刪去大量重複或類似的徵驗故事以外，朱珪也在其基礎上重新撰寫註釋，不僅語言較為簡潔，更重要的一點是大量引用十三經的內容進行註解，這一點是前兩者所不具備的。至於刪除《戒士文徵信錄》的原因，朱珪並沒有提及。考慮到《戒士文徵信錄》只有徵驗故事而無註解，《戒士文》本身則又已經收入《聖訓》之中，這或許是朱珪將之視作冗餘而刪除的原因罷。

如此，再一次審視《文帝書鈔》所收錄的文獻時，不難發現，朱珪將《文帝全書》內函中文昌帝君所啟示的內容悉數保留下來，而由同時代人所撰寫的內容——包括劉樵撰寫的《文昌帝君本傳》、潘成雲在《陰騭文註證》中的註釋和顏章敬在《丹桂籍註案》中的註釋——盡皆刪去。其意圖似乎是要編輯一套完全以文昌帝君本身為核心的純粹的合集，此為《文帝書鈔》的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則是朱珪在其中融入了更多儒生的傳統價值標準，這不僅可以從他捨棄了外函的符籙法咒中得以窺知，還可以從以下三條中看出：(1) 朱珪撰寫的《文帝世紀》，比起劉樵的《文昌帝君本傳》，更加側重於史的角度，通篇記述帝君在歷史上的多次降生和盡忠孝之本的「史實」，由此而超凡入聖，並非劉樵一文所強調的神靈顯化。其「史傳」的特點要遠遠大於「內傳」的特點。⁷⁸(2) 朱珪將《孝經》置於《化書》之前，也是注重「忠孝」為本，與上一條完全契合。(3) 朱珪在註釋《陰騭文》時，不同於潘成雲和顏章敬多用乩文善書，而是往往採用十三經的內容。進一步的忠孝化和儒生化，是《文帝書鈔》的第二個特點。

六·《文昌聖典》

(一) 已知版本的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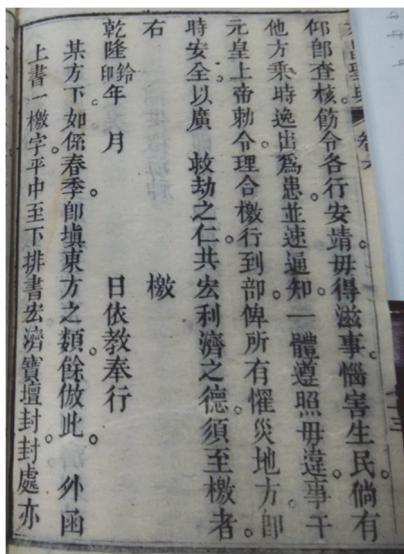
相比其他文帝類全書，《文昌聖典》的版本信息最為匱乏。至今為止，筆者只目見過道光二年的重刊本一種，現藏於南京圖書館。而且遺憾的是，該藏本

⁷⁸ 劉樵所寫的《文昌帝君本傳》則是基於《清河內傳》並補充《化書》的內容而成。

胡劫辰

中，只收錄了副文本兩篇，分別是王崐撰寫的重刊序和朱珪為《文帝書鈔》所寫的序言。而王崐的序言中，並沒有對《文昌聖典》的來龍去脈進行絲毫的描述，只是簡單談及了道光二年重刊之舉的緣起，⁷⁹ 因此對於了解《文昌聖典》的成書幾乎沒有幫助。

不過，《文昌聖典》所收錄的文本，仍然可以提供一些成書時間的參考。一方面，《文昌聖典》收錄的文本中，超過一半來自於《文帝全書》，而剩下的文本悉數來自於初本《文帝全書》編纂團體之一的文昌壇「鱣壇」，《文昌聖典》的成書極有可能是緊跟著《文帝全書》。另一方面，整本《文昌聖典》中，除去兩篇序言的時間分別是道光二年和乾隆三十三年以外，明確提及時間的文本中，最晚的是《筆錄科儀》的降乩時間，為乾隆乙丑，即乾隆十年。⁸⁰ 除此以外，《文昌聖典》中所收錄的《文昌敕演大洞治瘟寶籙補遺妙典》中，在檄文或其他行移文書的範式中，使用的示例時間為「乾隆」（參圖七），⁸¹ 由此推斷《文昌聖典》的初本應當成書於乾隆年間。



圖七：《文昌敕演大洞治瘟寶籙補遺妙典》「供檄海神」條

⁷⁹ 清·王崐，〈序〉，清·金本存，《文昌聖典》，卷首。該重刊本的緣起是王崐同鄉一徐姓寡婦為其病子發願刊刻。

⁸⁰ 參清·金本存，《文昌聖典》卷一九《筆錄科儀》。

⁸¹ 參清·金本存，《文昌聖典》卷一三《大洞治瘟符籙》。

另外一處細節，也能佐證以上的推測。在卷二一後附有一篇跋文，作者正是鱣壇的領袖金本存。跋文中明確提到：「茲慶善友孫紹謨，捐刻《文昌聖典》全集。」⁸² 由此，初本《文昌聖典》為乾隆年間鱣壇領袖金本存主持刊刻當無疑。加上道光重刊本中，王帽落款自稱為「平月王帽」，⁸³「平月」當為元置明裁的「平月長官司」，今屬貴州省，⁸⁴ 與金本存鱣壇所在的大定及刊刻初本《文帝全書》的清江相近。

（二）與《文帝全書》的比較

前文提到，《文帝書鈔》之於《文帝全書》（三十二卷本，下同）的兩大特點，分別是去除個人編纂因素的進一步純粹化，以及強調儒教價值面向的儒生化。而《文昌聖典》之於《文帝全書》可以說恰恰是完全相反的改造進路。一方面，《文昌聖典》增加了更多的來自永濟壇和鱣壇的降乩文本，⁸⁵ 使之具有非常強烈的個別乩壇的特徵；另一方面，《文昌聖典》將符籙部分從外函移至內函，並且增加了相當程度的科儀文本，凸顯出文昌帝君道教神祇乃至三教神祇的特點，而非體現單一的儒生意趣。

《文帝全書》和《文昌聖典》兩者之間的文獻變化可參表七。其中，兩者的外函和附錄部分用背景色標出，《文昌聖典》中的新增文本，用粗體字表示。

⁸² 清·金本存，《文昌聖典》卷二一《五進斗科儀》所附跋文。

⁸³ 清·王帽，〈序〉，清·金本存，《文昌聖典》，卷首。

⁸⁴ 參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787。

⁸⁵ 金本存於雍乾年間，先後活躍於重慶的永濟壇和貴州的鱣壇。

表七：《文帝全書》與《文昌聖典》所收文獻比較

卷數	《文帝全書》中的篇目		《文昌聖典》中的篇目	卷數
內函卷 1	文昌帝君本傳		孝經	內函卷 1
內函卷 2-4	化書		延嗣經	內函卷 2
內函卷 5-6	孝經新註		救劫經	內函卷 3
內函卷 7-9	大洞經示讀		大洞經示讀	內函卷 4-6
內函卷 10	本願經		本願經	內函卷 7
內函卷 11	救劫經		坤寧經	內函卷 8-9
內函卷 12	延嗣經		七品經	內函卷 10
內函卷 13-14	聖訓		朝天寶懺	內函卷 11
內函卷 15	陰騭文句頌		大洞紫陽寶籙	內函卷 12
內函卷 16-19	陰騭文註證		大洞治瘟符籙	內函卷 13
內函卷 20-23	丹桂籍		先天制儀	內函卷 14
內函卷 24	戒士文徵信錄		大洞吉祥神咒	內函卷 15
外函卷 25	大洞吉祥神咒		化書	內函卷 16-18
外函卷 26-28	大洞紫陽寶籙		筆錄科儀	內函卷 19
外函卷 29-30	治瘟寶籙		養心法懺科儀	內函卷 20
外函卷 31	集唐籤		五進斗科儀	內函卷 21
外函卷 32	文帝聖誥		躬行心懺科儀	內函卷 22
附錄 1	玉局心懺		玉局心懺	內函卷 23
附錄 2	躬行心懺		祿嗣祕訣	內函卷 24
附錄 3	清靜法要		清靜法要	內函卷 25
附錄 4	清靜法程		清靜法程	內函卷 26
附錄 5	祿嗣祕訣		靈驗事蹟	內函卷 27
附錄 6	坤寧妙經		聖訓、聖誥	內函卷 28
			丹桂籍註案	外函卷 29-30
			陰騭文句頌	外函卷 31
			陰騭文註證	外函卷 32-35
			戒士文徵信錄、先賢文錄	外函卷 36

從表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昌聖典》基於《文帝全書》所做出的幾大改變，包括內外函的結構、文本的順序變化以及新增加的文本。以下就這三點逐一進行探討。

1. 內外函的結構變化：

劉樵最初編纂《文帝全書》時，分內外函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帝君之教，以儒為主，而符咒之類，乃教外別傳，故分內外云」。⁸⁶ 具體體現為，經、訓和善書之類的文本，被劉樵歸為內函，而符籙法咒籤則被歸為外函。另外，文昌帝君下轄的仙真所降示的經文，則被統編為《羣真著述》，歸入附錄中。

而《文昌聖典》則徹底推翻了這一結構。通過表七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帝全書》中原本屬於外函和附錄的所有文本，在《文昌聖典》中悉數歸入內函；《陰騭文》和《戒士文》的註證書以及歷史文人所寫的文本——被其稱為「先賢文錄」——則被歸入外函。也就是說，《文昌聖典》中內外二分的依據，不再是以儒／道為標準，而更接近於聖／凡之分，即內函為神明啟示的文本，外函為世人和先賢編註、撰寫的文本。因此，不單單各種類型的文本——包括經、訓、符、籙、法、懺等——都被收入內函，對於啟示的神明也不局限於文昌帝君，還包括文昌帝君下轄的仙真以及真武大帝。如《七品經》和《朝天寶懺》即疑為真武的降經。而原本收入《羣真著述》的六種文本，以及新增的科儀，皆是文昌帝君下轄的仙真所降示的。

2. 文本的順序變化：

除了《陰騭文》類的文本推後進入外函，而原屬外函和附錄中的文獻提前收入內函之外，還有幾處文本順序的變化值得指出。

首先是《孝經》被提前冠以全書之首。結合《文昌帝君》所收錄的朱珪序，這或許是因為受到了朱珪及《文帝書鈔》的影響。其次是與之相對應的《化書》的大幅推後。作為早期文昌經——即明《道藏》中已經收錄的、成書於宋元間的文本——中最核心的經典之一，《化書》一直在文昌信仰者中享有著非常高的地位，但此處不僅僅被推後至所有早期文昌經的末尾，甚至連乾隆八年左右新出的《坤寧經》也位居《化書》之前。這或許是《文昌聖典》試圖打造一個統攝三教的文昌帝君的全新形象，因此將代表其早期神格的文本放在靠後的位置。最後一點是整個內函的順序結構，可以清晰地看到，卷一至卷一〇為「經」的部分，卷一一至卷二六主要為法懺科儀的部分，最後兩卷則是靈驗事蹟和訓文及誥文。至

⁸⁶ 清·劉樵，〈凡例〉，氏編，《文帝全書》（清乾隆八年至十年刊本），卷首。

於每個部分中文本是依據什麼原則排序的，則尚未找到文本上的確證，因此不進行任何揣測，以免落入過度詮釋的窠臼。

3. 新增加的文本：

《文昌聖典》相比《文帝全書》，新增的主要文本包括六種：⁸⁷ 內函卷一〇的《七品經》、內函卷一一的《朝天寶懺》、內函卷一四的《先天制儀》、內函卷一九的《筆錄科儀》、內函卷二〇的《養心法懺科儀》、內函卷二一的《五進斗科儀》。其中，前兩種為真武經典，但疑似與文昌降乩活動有密切聯繫，⁸⁸ 後四者則是文昌帝君下轄仙真所降示的科儀文本。這六者最大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是在金本存所在的乩壇中降示的。如若加上同樣乩壇降示的《大洞經示讀》、《坤寧經》、《躬行心懺科儀》、《祿嗣祕訣》、《清靜法要》和《清靜法程》，則金本存所活動的兩個乩壇中降示的文本達到了十五卷，超過了內函的一半體量。

在此可以一窺劉樵與金本存合作《文帝全書》時的權力關係。顯然，在《文帝全書》中占主導的劉樵並沒有收入金本存所在乩壇的所有降示文本，⁸⁹ 入選的文本中唯獨《大洞經示讀》進入了內函，剩下的也只是以附錄的形式附於全書之後。而《文昌聖典》中，劉樵的痕跡幾乎被完全抹去：他所撰寫的序言、《文昌帝君本傳》以及所有文本前的小序，盡皆刪去。而永濟壇和鱣壇的科儀文本大量編入，並且悉數收錄在內函之中。因此，《文昌聖典》所展示的，毋寧說是金本存及其所在文昌壇的意趣。

⁸⁷ 除此以外，尚有一些零星的新乩文，如卷一二的《大洞文昌司祿紫陽寶籙》中，附有〈帝君示詩〉三首和〈文昌大洞統護四方天驕上將牛示〉二則；又如卷一三的《大洞文昌治瘟寶籙祕法》中，附有〈北極幽垂法主一炁神武天尊示〉六則、〈大洞天驕上將通靈顯應法尊示〉三則以及《文昌敕演大洞治瘟寶籙補遺妙典》一種。

⁸⁸ 前者全稱「九重敕演玄帝度劫解厄保命賜嗣拔幽普利妙經」，所謂「七品」，分別是指〈大極區元品〉、〈靈霄簡真品〉、〈混元應誠品〉、〈真武虛疫品〉、〈太乙救慈品〉、〈正覺釋劫品〉、〈彰瘴因果品〉。後者全稱「太上元始天尊說祈福消災拔幽濟苦保命賜嗣真武朝天寶懺」。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卷三載呂祖降乩的〈依帝七品經序〉，後附夾注稱「經名九重敕演依帝度劫解厄保命賜嗣拔幽普利妙經」，當指此經。序文中提到「仁威博濟之誠，梓潼代演之功」，似乎暗示該經出自真武（仁威），而由文昌（梓潼）降示給信眾。參清·劉樵，《呂祖全書》（疑似清乾隆刊本），卷三。

⁸⁹ 《文昌聖典》中的部分科儀文本在雍正年間已經成型，但未能收入《文帝全書》之中。此外，尚有一些文本無法確定年代，不排除是在《文帝全書》成書之後才產生出來的這一可能。

七·《文昌帝君全書》

《文昌帝君全書》同樣基於《文帝全書》改編而成，但它又展現了不同於《文帝書鈔》和《文昌聖典》的風格。如果說《文帝書鈔》和《文昌聖典》分別著重體現翰林儒生和個別文昌乩壇的特徵，那麼《文昌帝君全書》則側重於四川地區的地方屬性，尤為有意識地強調四川——特別是七曲山——為文昌信仰的中心。

（一）已知版本的基本信息

《文昌帝君全書》現存至少三個版本。初本由四川榮昌地區的文人甘雨施在《文帝全書》和《文帝書鈔》的基礎上，刊刻於道光八年（1828）。該版本曾於道光三十年（1850）由時任四川總督的徐澤醇重刊。至光緒九年（1883），鄭子元赴京謁選時，受山陰余濤所託，在徐本的基礎上增輯重刊。今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有初本，惜為殘本。⁹⁰ 另北京大學藏有道光三十年重刊本和光緒九年重刊本各一套，不過筆者赴京查閱時，道光三十年本正在古籍修復中，故未得見。以下主要探討初本和光緒重刊本這兩個版本的成書背景和文本來源。

1. 道光八年本《文昌帝君全書》（以下簡稱「甘本」）：

該版本共收錄有四則序言，落款時間皆為道光八年。其中，主要編纂人甘雨施的序言中，明確提到：「帝君集散佚多矣，丁亥歲得於渝郡王觀察署中，增刪成帙，梓為全書。」⁹¹ 因此，該書編纂始於道光七年，成於道光八年當為無疑。而編纂者甘雨施自署為「榮昌後學」，加諸其餘序言皆稱之為「孝廉」，可知甘雨施當時並無特別顯赫的功名。不過另外三則序言的作者分別是時任道台及重慶知府的文綸、前大理寺正卿甘家斌以及時任榮昌知縣的「雲嵐氏」，⁹² 所以該書的刊刻或許得到了地方各級官員和鄉紳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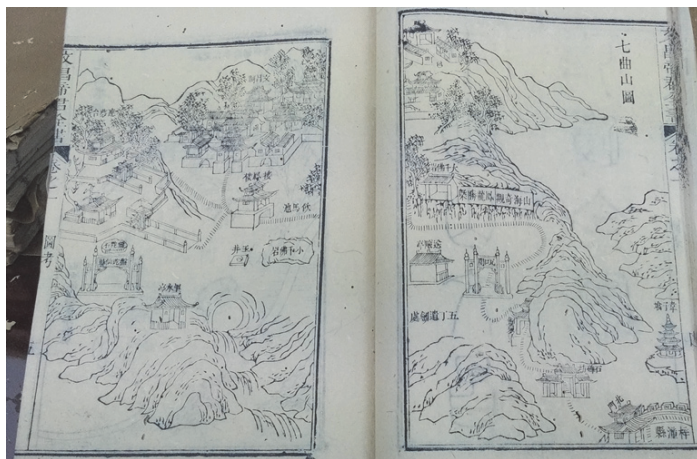
⁹⁰ 全書當為二十八卷，四川大學所藏殘本存卷首至卷二三，共計九冊二十三卷。

⁹¹ 清·甘雨施，〈文昌帝君全書序〉，氏編，《文昌帝君全書》（清道光八年刊本，成都：四川大學圖書館藏），卷首。

⁹² 清·文綸，〈文昌帝君全書序〉；清·甘家斌，〈文昌帝君全書序〉；清·雲嵐氏，〈文昌帝君全書序〉，清·甘雨施，《文昌帝君全書》（清道光八年刊本）。「雲嵐氏」真名不詳，甘雨施在凡例中稱其為「天水石觀察」，或為石姓，且兼任道員。

至於該版本的文本來源，則非常清楚：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和《文帝書鈔》是其最基礎的底本，另外，甘雨施也參照了大量的史志類文獻來增加與文昌帝君有關的古蹟信息，並且利用仙傳資料補充文昌帝君的神聖傳記。⁹³

不過除了以上凡例中提及的內容，甘雨施也用到了其他的材料。如甘家斌在序言中就提到，《文昌帝君全書》所收錄的多幅精細繪畫（見圖八），皆是當時為編書而特意請畫師赴七曲山繪製的。⁹⁴ 甘雨施還在凡例中提到，《文昌帝君全書》中的新增碑記出自梓潼縣署所藏，而匾額和對聯，則出自當時的七曲山大廟。⁹⁵ 另外，《文昌帝君全書》其實也使用了五十卷本的《文帝全書》，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它收錄只見於五十卷本的《忠經》、《開心神咒註釋》和《文昌心懺》。



圖八：《文昌帝君全書》所收〈七曲山圖〉

⁹³ 甘雨施在凡例第一條中就明確指出：「是書原本係義陵劉公體恕彙輯，大興朱文正公鈔要重刻。茲得劉公原本內外函三十二卷，刪去繁複，更採輯《欽定禮部則例》、《華陽國志》、《全蜀志》、《梓潼縣志》、《越雋廳志》、《名山縣志》、《唐志》、《元和志》、《一統志》、《寰宇記》、楊升安《藝文志》、《仙釋志》、《神仙通鑑》、李雨村《神考》諸書，增入九卷共得二十八卷。」清·甘雨施，〈凡例〉，氏編，《文昌帝君全書》（清道光八年刊本），卷首。

⁹⁴ 甘家斌稱：「榮昌吾宗岱雲孝廉，召徐熙手，躬涉梓潼，肖形繪畫，共得一十有三圖，列為『像圖』一門。」清·甘家斌，〈文昌帝君全書序〉，清·甘雨施，《文昌帝君全書》（清道光八年刊本）。

⁹⁵ 甘雨施稱：「帝君聖像，舊刻石碑，現藏成都府及梓潼縣署內。聖蹟多在蜀之西南，舊本未詳，圖考亦略。」清·甘雨施，〈凡例〉。

2. 光緒九年本《文昌帝君全書》（以下簡稱「鄭本」）：

光緒九年本《文昌帝君全書》由鄭子元在道光三十年徐澤醇重刊本的基礎上進一步增輯而成。鄭本一共保留了七篇序言，除卻甘本所收錄的四則寫於道光八年的序言外，鄭本還收錄了徐澤醇於道光三十年所寫的重刊序，以及余濤和鄭子元在光緒九年所寫的兩則序，據此可以還原出三個版本《文昌帝君全書》的重刊過程。

徐澤醇在序言記載到，其得見《文昌帝君全書》，是在道光二十九年趕赴蜀地任職途中，由七曲山大廟的廟祝所贈。⁹⁶ 由此可知徐澤醇的重刊是在甘本的基礎之上，並且也證實了甘本的成書確實與七曲山大廟有著密切的聯繫。不過進一步的比較，必須留待得見北大藏本之後才能進行。

至於余濤和鄭子元的序言，則非常完整地記錄了重刊的過程。根據余序的記載：「適有鄭筱唵明府，謁選至京，相遇於倪夢臣先生之正蒙義塾。……暇日恭捧《文昌帝君全書》至筱唵明府寓所拜訪，即以校對增輯全書之事託之。」⁹⁷ 因此鄭本的重刊是在北京完成的。余濤應當是主要出資人，而鄭子元則是整個過程中的統籌，按余濤的說法，鄭子元「不惟校對增輯之事一身任之，其一切修補錯訛、手民酒資數月、寫字友人修金，皆代為籌辦之。此外裝訂題籤，無一不經營盡善」。⁹⁸ 另一方面，鄭子元的序言中，則詳細地記錄了該書的重刊過程。⁹⁹ 除了獲得余濤的經濟支持外，尚有其友人劉守一提供住宅和飲食，張復來幫忙監工。在增輯文本的次序和目錄方面，則獲得了呂陽居和屠丙南兩位乩手的襄助，請雲龕道祖、丹陽道祖降乩訓示，並由潘濬川前往通州呂祖祠請求乩諭。書成之後，則由鄭子元所獲夢徵中的「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十二字作為十二冊的題簽。¹⁰⁰

根據鄭子元撰寫的凡例，其重刊所用的底本為甘本，並以徐澤醇的重刊本作

⁹⁶ 徐澤醇稱：「己酉奉命來蜀，於嘉平七日，道經七曲，瞻仰廟貌，禮拜維虔。稍憩靜室，廟祝以全書見示，藏諸行篋，公餘敬覽，始得詳其原委。」清·徐澤醇，〈序言〉，清·甘雨施編，鄭子元增輯，《文昌帝君全書》（清光緒九年刊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卷首。

⁹⁷ 清·余濤，〈重刊全書序〉，清·甘雨施，《文昌帝君全書》（清光緒九年刊本），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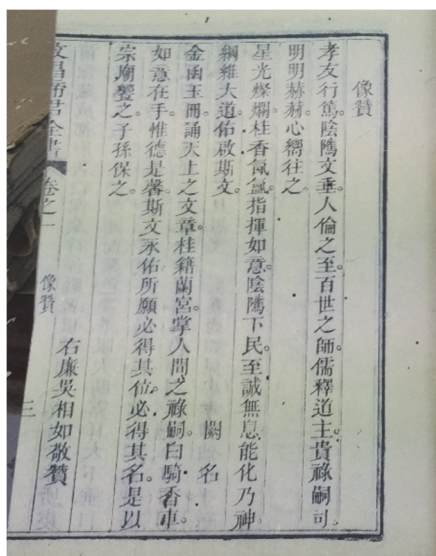
⁹⁸ 清·余濤，〈重刊全書序〉。

⁹⁹ 清·鄭子元，〈增輯全書序〉，清·甘雨施，《文昌帝君全書》（清光緒九年刊本），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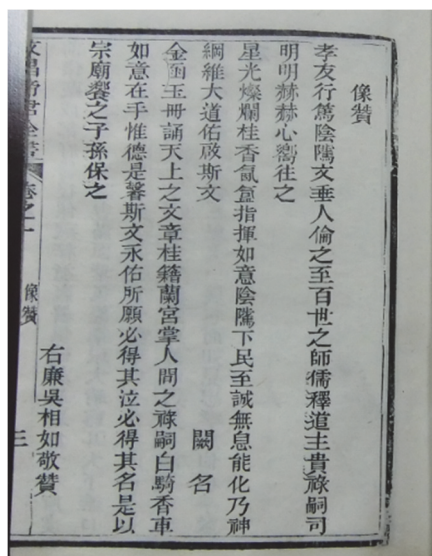
¹⁰⁰ 十二字語出《文昌帝君陰騭文》。

為參考。¹⁰¹ 不過鄭子元在甘本的基礎上，增加非常多的內容，其稱「又得數十萬言，而採入之」。¹⁰² 而這些新增的內容，來自於各種各樣的文本，主要則是依託於北京城內豐富的古籍資源。一方面，鄭子元「在琉璃廠書攤，搜買多種，並在藏書大世家、大叢林，暨同年至好友人各家，借覓數十種，敬謹擇錄」。¹⁰³ 另一方面，他也大量參考了《道藏輯要》、《玉經箋注》等大部頭叢書。鄭子元在書中屢次提及他參閱《道藏輯要》的記錄，最初四次至北京，是由友人劉守一代為借得；後又於北京白雲觀中，通過方丈高雲溪得見觀中藏本。¹⁰⁴

不同於徐澤醇的重刊，鄭子元在重刊過程中增輯的內容幾乎要趕上原書的體量。不過通過比對不難發現，鄭本的增輯是在翻刻的基礎上進行的，而非將原書完全重新排版刊印，通過圖九的版刻比較就能一目了然：



道光八年本《文昌帝君全書》



光緒九年本《文昌帝君全書》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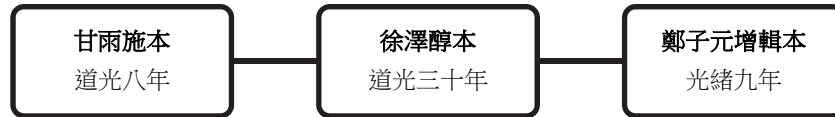
¹⁰¹ 凡例中先後提到，「今之恭修全書，仍照甘岱雲孝廉原本」，「《功過格》各篇，應列入「聖訓」之中，惟嫌以匾聯作收，結局無大。因仍照徐宮保刻本……」清·鄭子元，〈新增凡例〉，清·甘雨施，《文昌帝君全書》（清光緒九年刊本），卷首。

¹⁰² 清·鄭子元，〈新增凡例〉。

¹⁰³ 清·鄭子元，〈新增凡例〉。

¹⁰⁴ 清·鄭子元，〈跋文〉，清·甘雨施，《文昌帝君全書》（清光緒九年刊本），卷七，〈文昌帝君大洞經自敘〉後。

綜上，《文昌帝君全書》的版本流傳變化，如下所示：



(二) 與《文帝全書》的比較

通過上文的版本分析可知，《文昌帝君全書》在《文帝全書》的基礎上進行了不小的改動，具體的變化之處大致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1) 徹底取消了內外函的分法，改為分設十個門類，分別是「像圖」、「全傳」、「聖經」、「聖訓」、「古蹟」、「靈應」、「藝文」、「考辨」、「靈籤」、「匾聯」。(2) 仿照《文帝書鈔》的體例，將符籙和《羣真著述》等文本悉數刪去，但保留了《玉局心懺》；《陰騭文》的各個註證本也不予保留，只收錄朱珪編輯的《陰騭文註》。(3) 將《陰騭文句頌》以及原本屬於《聖訓》的賦、記類文章，悉數歸為世俗創作的藝文類。(4) 收入了五十卷本《文帝全書》中的個別文本，如《忠經》、《開心神咒註釋》、《文昌心懺》。(5) 依託梓潼縣和七曲山大廟的資源，增入了「像圖」、「古蹟」和「匾聯」三個門類的作品。(6) 增加了甘雨施自己撰寫的文章，尤其是「考辨」一門所收最多。(7) 增入甘雨施收集的其他文本，世俗文學創作與乩壇文本皆有涉及。

整部甘本的收錄文本詳如表八：¹⁰⁵

表八：甘本《文昌帝君全書》收錄的文本及來源

門類	卷數	篇目	對應《文帝全書》中的內容 ¹⁰⁶
像圖	卷 1	成都府藏像 等	新增
全傳	卷 2	清河內傳 等	1. 聖訓·清河內傳（卷 13）
			2. 文昌帝君本傳（卷 1）
			3. 文帝世紀（《文帝書鈔》卷首）
			4. 其餘內容為新增

¹⁰⁵ 由於四川大學所藏為殘本，因此卷二四以下部分為參考甘本目錄和重刊的鄭本所得。

¹⁰⁶ 《文昌帝君全書》的內容，部分來自不同版本的《文帝全書》及《文帝書鈔》等，此列中如若沒有特別指出，則默認為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

門類	卷數	篇目	對應《文帝全書》中的內容
聖經	卷 3	孝經	孝經新註（卷 5-6）
		忠經	忠經（五十卷本《文帝全書》卷 4）
	卷 4-6	大洞經示讀上、中、下	大洞經示讀（卷 7-9）
	卷 7	本願經	本願經（卷 10）
	卷 8	救劫經	救劫經（卷 11）
	卷 9	延嗣經	延嗣經（卷 12）
	卷 10-12	化書上、中、下	化書（卷 2-4）
聖訓	卷 13-14	聖訓上、下	1. 聖訓（卷 13-14）
			2. 其餘內容為新增
	卷 15-16	陰騭文註上、下	陰騭文註（《文帝書鈔》卷 13-14）
	卷 17	開心呪註釋	開心神呪註釋（五十卷本《文帝全書》卷 32）
		玉局心懺	玉局心懺（五十卷本《文帝全書》卷 38）
	卷 18	文昌心懺	文昌心懺（五十卷本《文帝全書》卷 40）
古蹟	卷 19	梓潼縣 等	新增
靈應	卷 20	唐孫樵遇雨 等	1. 文昌帝君本傳（卷 1）
			2. 其餘內容為新增
藝文	卷 21	藝文上・頌	陰騭文句頌（卷 15）
	卷 22	藝文上・記	1. 聖訓下（卷 14）
			2. 其餘內容為新增
	卷 23	藝文中・序、跋	1. 三十二卷本及五十卷本《文帝全書》中的序跋
			2. 《文帝書鈔》的序跋
			3. 其餘內容為新增
	卷 24	藝文下・詩	新增
	卷 25	藝文下・賦	1. 聖訓下（卷 14）
			2. 其餘內容為新增
考辨	卷 26	文昌考辨 等	新增
靈籤	卷 27	集唐一百首	新增
		集唐九十七首	集唐籤（卷 31）
匾聯	卷 28	匾八	新增
		聯九	

根據表八所顯示的內容，很難斷言三十二卷本、五十卷本《文帝全書》和《文帝書鈔》這三種文獻，究竟哪個對甘本的影響最大。無論是文本順序還是編排結構，甘本與前三者都存在極大的差異。無論是三十二卷本《文帝全書》強調的儒道內外之別，抑或《文帝書鈔》所堅持的對神聖文本和世俗文本的區分，在《文昌帝君全書》這裡都已經不復存在。這毫無疑問和編纂團體本身的背景也有關係。由甘本的四則序言中可以看到，無論是編者本人抑或支持他的官員、鄉紳，都沒有提起任何乩壇抑或法派的背景。也就是說，文昌帝君之於甘本的編纂團體，並非是他們個人參與的宗教團體所供奉的主神。因此其編纂的意圖顯然有別於所有《文帝全書》的編纂團體。要進一步解釋甘雨施等人的編纂動機，則須結合《文昌帝君全書》的另一個特點，即冠以全書之首的是嘉慶六年禮部頒布的將文昌帝君列入群祀的祭例。也就是說，對於甘雨施等人而言，編纂《文昌帝君全書》的一個重要動機，很有可能是因為源自於其家鄉四川地區的文帝成為國家祀典中的正神，由此而為之編全書、立神傳。

基於以上原因，《文昌帝君全書》在錄入文本的時候，不僅僅將代表神靈顯化的經典和乩文收入其中，同樣也絲毫不排除世俗文人所創作的文學作品。更具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依託四川地區地方史志的大量文本和圖像也收入其中，竭力強調梓潼為文昌帝君信仰中心的這一特點。因此，地方性——具體而言是四川的地方性——為甘本《文昌帝君全書》的主要特點之一。

反觀鄭本，雖然鄭子元並非四川籍士人，該版本的編輯也是在遙遠的北京所完成，但是鄭本仍然保留了甘本和徐本中的四川元素，同時還進一步強調七曲山的重要地位。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增加了所謂「七曲舊本」的《文昌孝經》。他在凡例中解釋道：「『聖經』以《孝經》為先，天經地義，萬古不磨之極軌也。其先列六章《孝經》，次列七曲舊本者，以六章《孝經》，相傳已久，雖偈語近於梵唄，而詞義精當，中人以下，皆可與言。七曲舊本，黃公正元，遵帝君諭而刊刻之，此為中人以上說法也。因兩存之，不可妄刪。」¹⁰⁷ 由此可見，他將黃正元所刊刻的七曲舊本《文昌孝經》收入全書中，視其地位要高於傳統的《文昌孝經》，且代表了文昌信仰之正統。出生漢南地區的鄭子元對四川作為文昌信仰中心的強調，應當同其早期經歷有關。他在序言中回憶到，家中常年供奉文昌帝君，同治癸亥，母親獲得文昌帝君托夢警告，為避戰亂，「避居蜀之深山中，城

¹⁰⁷ 清·鄭子元，〈新增凡例〉，清·甘雨施，《文昌帝君全書》（清光緒九年刊本），卷首。

破而全家無恙」。¹⁰⁸ 結合這一點，則鄭本對七曲山的重視也就有據可依了。

不過與甘本極為不同的是，扶乩的元素在鄭本中再一次大量出現。雖然不同於各版本的《文帝全書》和《文昌聖典》，其編纂都圍繞著一個核心的文昌乩壇，而鄭子元似乎並不歸屬於某個特定的扶乩團體，但鄭氏也確確實實信奉扶乩所帶來的神明啟示。這從上文提及的編纂過程中多次問乩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鄭子元在甘本的基礎上增加了將近一半的內容，其中絕大部分都屬於他所收集的扶乩文本，既包括《道藏輯要》中的經懺及詩歌，¹⁰⁹ 也包括他在書肆和朋友處搜羅的文本。今將兩者收錄文獻列表對比如下：

表九：甘本及鄭本《文昌帝君全書》收錄的文本及比較

甘本《文昌帝君全書》			鄭本《文昌帝君全書》			
門類	卷數	篇目	門類	卷數	篇目	備註
像圖	卷 1	成都府藏像 等	像圖	卷 1	成都府藏像 等	無變化
全傳	卷 2	清河內傳 等	全傳	卷 2	清河內傳 等	
				卷 2	文昌帝君集福寶懺	新增
				卷 2	文昌帝君宣化三教懺	
聖經	卷 3	孝經	聖經	卷 3	孝經	無變化
		忠經				刪去忠經
				卷 3	七曲舊本孝經十八章	新增
	卷 4	大洞經示讀上		卷 4	救劫孝經	
	卷 5	大洞經示讀中		卷 5	救劫經	順序調換
	卷 6	大洞經示讀下		卷 6	延嗣經	
	卷 7	本願經		卷 7	大洞經示讀上	
	卷 8	救劫經		卷 8	大洞經示讀中	
	卷 9	延嗣經		卷 9	大洞經示讀下	無變化
	卷 10	化書上		卷 10	化書上	
	卷 11	化書中		卷 11	化書中	
	卷 12	化書下		卷 12	化書下	新增
				卷 12	救劫寶誥註解	

¹⁰⁸ 清·鄭子元，〈增輯全書序〉，清·甘雨施，《文昌帝君全書》（清光緒九年刊本），卷首。

¹⁰⁹ 包括但不僅限於卷二《文昌帝君集福寶懺》、卷二《文昌帝君宣化三教懺》和卷一七《詩集》中的大量乩詩。

甘本《文昌帝君全書》			鄭本《文昌帝君全書》			
門類	卷數	篇目	門類	卷數	篇目	備註
聖訓	卷 13	聖訓上	聖訓	卷 13	聖訓上	無變化
	卷 14	聖訓下		卷 14	聖訓下	
				卷 14	聖訓一	新增
				卷 14	聖訓二	
				卷 14	聖訓三	
				卷 14	聖訓四	
				卷 14	聖訓五	
	卷 15	陰騭文註上		卷 15	文昌帝君親解陰騭全文	無變化
	卷 16	陰騭文註下		卷 15	陰騭文註上	
				卷 16	陰騭文註下	
卷 17	開心呪註釋	卷 17	詩集	新增		
	玉局心懺	卷 17	開心呪註釋	無變化		
卷 18	文昌心懺		玉局心懺			
古蹟	卷 19	梓潼縣 等	古蹟	卷 19	梓潼縣 等	無變化
靈應	卷 20	唐孫樵遇雨 等		卷 20	唐孫樵遇雨 等	
藝文	卷 21	藝文上・頌	藝文	卷 21	藝文上・頌	無變化
	卷 22	藝文上・記		卷 22	藝文上・記	
	卷 23	藝文中・序、跋		卷 23	藝文中・序、跋	
				卷 23	自題陰騭文圖說 等	新增
	卷 24	藝文下・詩		卷 24	藝文下・詩	無變化
卷 25	藝文下・賦	卷 25	藝文下・賦			
考辨	卷 26	文昌考辨 等	考辨	卷 26	文昌考辨 等	無變化
靈籤	卷 27	集唐一百首	靈籤	卷 27	集唐一百首	
		集唐九十七首			集唐九十七首	
匾聯	卷 28	匾八	匾聯	卷 28	匾額	無變化
		聯九			對聯	
					文昌帝君惜字真詮廣義	
					勵士功過格	
		功過格				

需要特別解釋的是，鄭子元增輯的方法不太常見：鄭氏不希望破壞甘本十大門類和二十八卷的結構，但又有大量的新文本要增入其中，因此他選擇將大部分新增文本以新增一卷的形式插入其中，但卷數並不增加。如卷三《孝經》之後，再單獨新列一卷卷三，為《七曲舊本孝經十八章》；又如卷一七《開心呪註釋》和《玉局心懺》之前，再單獨新列一卷卷一七，為《詩集》；再如卷一四《聖訓下》之後，再新列五卷卷一四，為新補充的《聖訓一》至《聖訓五》。至於新增的卷帙是列於卷前抑或卷後，似乎就是鄭氏所說由扶乩訓示來決定的了。

由鄭本再與《文帝全書》抑或《文帝書鈔》進行比較的話，會發現後兩者的痕跡和比重已經大大降低了。顯然，鄭子元並不固定歸屬於某個文昌乩壇，其編纂的動機也並非為任何乩壇爭取文本上的權威，而更接近於刊行善書的一種善舉，故而其收錄的文本也更為寬泛，同時也較為駁雜。其時間跨度也較大，既有乾隆初就已經成書的《七曲舊本文昌孝經》，也有在咸豐才產生的《文昌帝君集福寶懺》。

以上是各個版本文帝類全書的出版情況，其中，各個版本的基本信息可參文末附表，版本流傳圖可參文末附圖。

八·小結：清代文帝類全書與「儒教」內涵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早期文昌經從誕生之初就帶有明顯的道教元素——其創製的關鍵人物劉安勝當為蜀中道士，其後也被正式收錄進明《正統道藏》——但是自始至終，儒教的元素在文昌信仰和文本中從未缺席。無論是文昌神司掌科舉與祿命的神職、還是早期文昌經中對孝道的重視，乃至其大量的儒生信徒，都是文昌信仰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事實上，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在論述《道藏》中的民間信仰問題時，就談及了由梓潼神演化而來的文昌神：儘管存在著道教經典——文昌神在某種程度上不僅受到「道封」、還受到「國封」，因此無論在道教層面還是國家祭祀層面都獲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然而「（文昌）基本上還是民間的神明」。¹¹⁰ 換言之，就算有道士所創製的早期文昌經的存在，也不能消弭其作為民間神祇的特徵。有趣的是，施舟人在文章結尾處還提到：「不少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已注

¹¹⁰ 施舟人，〈《道藏》中的民間信仰〉，氏著，《中國文化基因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95。

意到民間香火與道教之間的密切聯繫。而同樣重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更為重要的民間宗教和儒教之間的關係，則相對不被重視。」¹¹¹

（一）《文帝全書》建構「儒教正宗」的嘗試

而本文所探討的文帝類全書，就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來重新審視文帝信仰和儒教之間的關係。不同版本的《文帝全書》中，最為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編纂團體將文帝遵奉為「儒教正宗」，就目前掌握的證據來看，這一提法從初本《文帝全書》已經出現，因此可以說是肇始於劉樵，並且被後來的編纂者所接受。

當劉樵及後續的編輯者在建構「儒教正宗」這一宗教敘述的過程中，首先處理的就是如何從儒生的角度來詮釋文帝信仰與儒教的相適性。根據劉樵所撰寫的序言可以發現，其中多處暗示著劉樵明確地知曉文帝也具有道教神祇的這一屬性。如他在回憶自己早年的學習經歷時就說到：「余少時從梅中軒師，講伊洛之學，於二氏多不道，獨心悅誠服於帝君。」¹¹²類似的敘述還包括：「吾觀世間讀書世子，於仙與佛之學，不無有從有違；於天與神之故，亦或有疑有信。獨文昌帝君，則智愚賢不肖，莫不信而從之，與孔子等。」¹¹³可見他並不否認文昌帝君可以歸為「二氏」/「仙佛」的範疇。而在劉樵看來，文帝之所以能夠同樣被視作儒教神祇，主要出於兩點，一是《化書》的神聖歷史中，文帝的諸多化身是以儒生身分超凡入聖，即所謂「至帝君以人而為神為天，以儒而為仙為佛，……與孔子有異世而同揆者」。¹¹⁴二是文帝所啟示的教化，與儒教相表裡。即「文帝之書，以宣儒教而不離乎釋道、不雜乎釋道。……反覆玩索，本於一孝」。¹¹⁵

在此之後，絕大部分參與編輯、重刊《文帝全書》以及為之作序跋的儒生，大多持有相當的觀點。譬如彭啟豐為關本《文帝全書》所寫的序言中，就強調兩點，一是文帝本身符合儒教的祭祀體系和鬼神觀念：「文昌之祀由來舊矣。古者五行之官祀為貴神，肩吾處於泰山，傳說託於龍角，生為明聖，歿為明神，其理

¹¹¹ 施舟人，〈《道藏》中的民間信仰〉，頁100。

¹¹² 清·劉樵，〈文帝全書序〉，氏編，《文帝全書》（清乾隆八年至十年刊本）。

¹¹³ 清·劉樵，〈文帝全書序〉。

¹¹⁴ 清·劉樵，〈文帝全書序〉。

¹¹⁵ 清·劉樵，〈文帝全書跋〉，氏編，《文帝全書》（清乾隆八年至十年刊本）。

固然，無足異者。」¹¹⁶ 二是文帝的訓誡與儒經相表裡，他稱文帝感於其祖父彭定求的孝弟之德，故而降乩其家，「言深切著明，實與六經四子相表裡」。¹¹⁷類似的敘述可以從許多序跋中找到，此處不再羅列。

其次，「儒教正宗」的敘述中，不單單包含有文帝與儒教的相適性，還強調文帝信仰作為「正宗」的正統性地位。而這一論述的建構主要建立在文帝與孔子以及文帝經典與儒教經典這雙重比較之上。俞文耀為憇園本《文帝全書》所寫的序言中，似就將兩者視作一體的兩面：「儒教有孔子為之宗師矣，何為又有文帝？王公守溪曰：『文昌，先天之孔子；孔子，後天之文昌。』陳公密山曰：『以人道設教者孔子，以神道設教者文昌。』皆言其一而二，二而一也。」¹¹⁸ 上文所引用的彭啟豐的序言也表明了類似的內涵。陳惠榮在其序言中，還特別強調文帝經典出於扶乩的這一特點與儒教也並不相違背，其主要出於《尚書》所謂「惟天陰隲下民」的精神：「後世人心不古，詐偽繁滋。聖賢之訓，既視為陳言；王者之法，又難繩及屋漏。於是天帝鑒觀，世尊悲憫，遣正神間出其奇以顯化之，使知赫赫明明之不可掩如此也，此陰鷲下民意也。」¹¹⁹ 無論是俞文耀所引用的「神道設教」的說法，抑或是陳惠榮所稱「天帝」「遣正神」來啟迪全新的「聖賢之訓」、以訓誡來補充「王者之法」，都表明這些儒生高級官員試圖將文帝信仰與他們所認識的儒教正統學說相融合的一種嘗試。

也就是說，劉樵和之後參與編纂刊行的儒生，都通過《文帝全書》的出版，將自己所尊奉的文帝信仰，與儒教正統觀念相結合，賦予文帝作為道教神祇之外的全新定位。這一嘗試一方面代表文帝信仰團體中的儒生通過自己的身分和視角重新詮釋這一信仰的宗教內涵，另一方面，也標示著清初以降的儒生在試圖通過文帝信仰的相關實踐和文本反過來重新詮釋他們心中的儒教內涵，而《文帝全書》恰恰就是這兩種嘗試相碰撞的產物。

（二）儒—道光譜中的文帝類全書

如果將考察的視野從《文帝全書》進一步擴展到《文帝書鈔》和《文昌聖

¹¹⁶ 清·彭啟豐，〈序〉，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首。

¹¹⁷ 清·彭啟豐，〈序〉。

¹¹⁸ 清·俞文耀，〈憇園重刊本序〉，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卷首。

¹¹⁹ 清·陳惠榮，〈文帝全書序〉，清·劉樵，《文帝全書》（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卷首。

典》的話，可以進一步窺見不同類型的文帝類全書在「儒教」與「道教」的光譜中佔據不同的位置。

《文帝書鈔》雖然表面上看是節選、抄錄《文帝全書》而成，但其對文本選擇的標準和重新編輯的細節顯示出朱珪對於強化文昌帝君相關文本合集中儒生特質的明顯意圖。而刪去世人的文本創作，也助其將該書的神聖性進一步提純，使文昌帝君作為儒教神的新特質更加突出。從《文帝書鈔》中可以看到信仰文昌帝君的儒生將之與傳統儒教價值內涵——尤以忠孝為核心——不斷強化的過程，其比之《文帝全書》中「儒教正宗」的說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劉樵在《文帝全書》的序言中還反覆提及文帝的道教神祇的屬性，而朱珪則在編纂《文帝書鈔》時，直接將文帝默認為儒生士人的神明：「士人束髮讀書，則知尊文昌帝君，而或不能覽全書詳本末，是數典而忘其祖也。」¹²⁰ 而且，正如上文所論述的，朱珪不再沿用內外函的分法，未將收錄有符籙法咒的外函部分錄入《文帝書鈔》中，很有可能就是為了更進一步強調《文帝書鈔》所具有的儒教屬性。相比之下，如果說《文帝全書》所稱的「儒教正宗」是強調文帝出入於三教而尤重儒教的話，那麼《文帝書鈔》所體現的文帝信仰則是完完全全的儒教面向了。事實上，從《文帝書鈔》在有清一代大量重刊、遍佈不同區域但文本卻保持高度穩定的出版史特徵中，就可以看到它所反映的價值在清代儒生中所獲得的認同。

《文昌聖典》則展示了幾乎與之相左的另一種宗教個性。同樣參與初本《文帝全書》編纂的金本存，在此之後又特意刊行了這部沒有任何劉樵痕跡的《文昌聖典》，此事本身就已經展示出單個編纂團體內部的張力。雖然《文昌聖典》並沒有否認文昌帝君所具有的儒教屬性，但金本存——落款為「九天嗣籙正一真人」——毫無疑問對自己的道士身分和所歸屬的乩壇有著高度的認同，因此由他主導的《文昌聖典》顯而易見地重視文昌乩壇中的科儀、法籙和神譜。因此《文昌聖典》在整個文帝類全書的光譜中，最為側重文昌帝君作為三教神以及道教神的神格特徵，該書所具有的乩壇個性也是最為突出。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何它的流傳頗有限制，不僅幾乎未見於其他記載，如今也僅存重刊本一種，且與初本同樣出自於貴州地區。但誠如上文所分析的，《文昌聖典》代表了文帝儒教內涵之光譜的另一端，即文帝雖然關注、指引著世間儒生士人，但其本身仍然是兼具三教（尤其是儒道二教）的神明，因此除了儒教義理之外，也強調其科儀的作用。

¹²⁰ 清·朱珪，〈序〉，氏編，《文帝書鈔》（清乾隆六十年刊本），卷首。

《文昌聖典》的科儀性是《文帝書鈔》所不具備——甚至說是主動迴避的。因此，《文昌聖典》的例子，反過來也能說明，文帝信仰在清代的發展，並不是從道教轉向儒教的一個簡單的單線過程，而是其宗教內涵和光譜沿著不同方向不斷擴大的動態過程。

（三）正祀—扶乩光譜中的文帝類全書

《文昌帝君全書》的情況較前兩者要更為複雜，因為道光初本和光緒年間的增輯本之間就已經存在較大的差距。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兩者對於扶乩的重視程度不一。相比文帝的飛鸞開化，甘本《文昌帝君全書》更加側重於文帝的國祀正神的屬性。無論是《文帝全書》還是《文帝書鈔》和《文昌聖典》，都成書於乾隆年間，而《文昌帝君全書》則成書於道光年間，此時文昌帝君已經被列入國家祀典。因此，同樣是將文帝視作儒教正神，《文昌帝君全書》的側重點就在於文帝已經完完全全地上升為正祀，而非《文帝全書》、《文帝書鈔》和《文昌聖典》中啟示性的、儒生職業神性質的神祇。其編纂的風格也與另外三者注重啟示文本不同，反而大量收錄了史志類的文本。換言之，作為國家祭祀系統中的神明，文帝信仰的正統性已經毋庸置疑，也無需進一步論證「儒教正宗」這一論述的合法性。因此，《文昌帝君全書》所展示的文帝信仰中的儒教內涵，是以正祀為主要著眼點。

事實上，甘本十個門類的編纂結構並非是一時獨創，如果比較甘雨施在同一時期編輯的《關聖帝君全書》，則可以發現兩者的結構非常相似。¹²¹ 更為重要的是，《關聖帝君全書》的這一結構也並非甘雨施的原創，而可以向上追溯至張鎮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編的《關帝志》，甚至更進一步追溯至張鵬翮於康熙二十年（1681）所編的《關夫子志》。¹²² 由此可以推斷，甘雨施編纂《文昌帝君全書》和《關聖帝君全書》時，其構想的結構是來自於關帝類全書——尤其是《關帝志》的系統，而非文帝類全書的系統。已有的研究表明，《關帝志》所代表的關帝類全書並非是一種強調扶乩、啟示、救劫、勸善的善書系統，而是一種

¹²¹ 甘本《文昌帝君全書》的門類分別是「像圖」、「全傳」、「聖經」、「聖訓」、「古蹟」、「靈應」、「藝文」、「考辨」、「靈籤」、「匾聯」；而《關聖帝君全書》的門類分別是「像圖」、「全傳」、「文翰」、「聖經」、「聖訓」、「古蹟」、「靈應」、「紀驗」、「靈籤」、「考辨」、「藝文」。

¹²² 關於關帝類全書的文本演變與流傳，可參胡劼辰，〈明清關帝文獻初探〉，頁 92-115。

指向傳統祭祀的史志系統。¹²³ 在探討關帝類全書的研究中，伊藤晋太郎和高萬桑都觀察到上述類型上的二分傾向：伊藤氏稱之為偏向熱烈崇拜和偏向史實編纂的二級分化，¹²⁴ 高萬桑則稱前者是聖經型的 (scriptural)，後者是聖傳型的 (hagiographical)。¹²⁵ 甘本《文昌帝君全書》則顯示出，這種類型上的二分傾向同樣也出現在文帝類全書的編纂中。更具體而言，甘本《文昌帝君全書》和其餘文帝類全書的比較可以展現出表現文帝神格的另一種光譜：即作為國家正祀大神的神格和作為民間飛鸞開化的啟示型的神格。

(四) 清代的扶乩信仰、文本創製與宗教圖景

綜上，《文帝書鈔》、《文昌聖典》和《文昌帝君全書》在《文帝全書》所構建的「儒教正宗」的宗教內涵上，又各自推進了一步。《文帝書鈔》特別側重於文帝的文本是針對儒生的全新啟示，用以羽翼舊有的儒教經典。《文昌聖典》強調文帝綜攝三教，儒教義理和道教科儀並舉的特點。而《文昌帝君全書》則突出了文帝已經上升為國家祭祀系統中的正神，屬於名正言順的儒教正統。

多種文帝類全書所構成的光譜甚至不是單一維度的：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同編纂團體對文帝信仰的定位搖擺於儒道之間，處在光譜的不同位置（譬如《文帝書鈔》似乎偏向更純粹的儒教，而《文昌聖典》則偏向更傳統意義上的道教）；另一方面，其神格特徵也在另一個光譜——即啟示性的儒生職業神、保護神和官方正祀的地方神、國家神——之間浮沉。在這裡，扶乩這一宗教實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為一個早已獲得「道封」和「國封」的神祇，文帝在儒生士人的扶乩中不僅僅是單方向地為扶乩團體的活動和文本創製提供神聖的權威來源，其扶乩信仰的擴展和藉助明末興起的坊刻本而廣為流傳的勸善書和新經典，也反過來不斷地強化、補充和更新其神性。換言之，扶乩及其產生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於「道封」和「國封」的另外一種為民間信仰提供權威性的手段。這當然得益於坊刻本的大量出現和刊印成本的降低，從而打破了國家和宮觀對神聖性的壟

¹²³ 洪淑苓，〈文人視野下的關公信仰：以清代張鎮《關帝志》為例〉，《漢學研究集刊》5 (2007)：139-166。

¹²⁴ 伊藤晋太郎，〈関羽文献の本伝について〉，《慶應義塾大学藝文学会》93 (2007)：42-44。這種二分的方式也一直貫徹在伊藤氏最新的專著之中。參伊藤晋太郎，〈「関帝文献」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8）。

¹²⁵ Goossaert, "The Textual Canonization of Guandi," p. 514.

斷，使得大量的地方知識分子也能參與到對神祇神格的建構和解釋中去。¹²⁶ 誠如在文帝類全書中所看到的那樣，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團體的編纂活動構成了一個極其寬廣的光譜。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正如本文引言部分所說，文帝類全書的編撰活動也往往與呂祖、關帝的相關團體和活動交織在一起。因此本文的發現同樣也能有補於我們對帝制晚期中國的扶乩信仰和相關文本創製的整體理解。

事實上，上世紀末便出現針對明清時期呂祖降乩信仰的研究，近二十年來已有一定成果，黎志添最近在此基礎上撰文考察了明萬曆至清嘉慶年間（1573-1820）道教呂祖扶乩信仰的整體發展面貌。¹²⁷ 文中總結了呂祖降乩信仰的四種宗教特徵，大致可以歸結為：(1) 由虔奉乩仙呂祖的弟子結社立壇；(2) 呂祖乩壇弟子大多為虔奉呂祖的儒生，而非傳統道派的道士；(3) 呂祖往往是受道教元始天尊、玉皇上帝或太上道祖等上界神明之命，藉乩壇降經以度化蒼生；(4) 呂祖的仙階和地位也在明清時期隨著呂祖乩壇的盛行而不斷提升。¹²⁸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扶乩信仰、儒教和道教三者之間的互動，尤其是呂祖扶乩信仰對道教神譜和儒教正祀系統的影響。更具體而言，黎師在該文最後通過證據證明，清代呂祖正祀的官方化及地方化也是明末以降呂祖扶乩信仰在各地文人乩壇不斷擴展的結果。其更早的研究則指出：「一方面，呂祖的降乩信仰與元明時期全真教的發展並沒有直接關係；另一方面，以呂洞賓信仰為核心的道教乩壇卻又成為明末清初以後道教發展的主要特徵。」¹²⁹

高萬桑在探討帝制晚期中國的文人扶乩和精英階層中的救劫觀念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時，也發現十八、十九世紀的官員和精英階層能夠在其書寫中將正統儒教的觀念與各種各樣的私人宗教生活——包括修煉、扶乩、以及信奉文昌、呂祖、關帝等神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¹³⁰ 結合本文的觀察，可以發現崇奉文昌、呂

¹²⁶ 關於坊刻本在明末的興起，可參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頁46-63。

¹²⁷ 黎志添，〈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及相關文人乩壇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5（2017）：139-179。

¹²⁸ 黎志添，〈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及相關文人乩壇研究〉，頁144-145。

¹²⁹ 黎志添，〈識見、修煉與降乩：從南宋到清中葉呂洞賓顯化度人的事蹟分析呂祖信仰的變化〉，《清華學報》46（2016）：65。

¹³⁰ Vincent Goossaert, "Modern Daoist Eschatology: Spirit-Writing and Elite Soteri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6 (2014): 238.

祖、關帝的明清文人乩壇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宗教潮流，即以扶乩信仰為媒介，吸收道教、儒教和民間信仰的各類元素，¹³¹ 不僅自成一體，也反過來影響道教神明和經典的體系、儒教的觀念和正祀系統、以及民間信仰的儀式和文本等多個方面。本文所揭示的或為這一歷史圖景的一隅，希望未來的研究中，能夠進一步結合不同扶乩團體的活動和文本創製，從而更加全面地展現清代知識分子的宗教圖譜。

（本文於民國一〇七年十月九日收稿；一〇八年四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後記

前期資料收集過程中，承蒙黎師志添、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教授、王見川教授、維習安 (Christian Wittern) 教授、武田時昌教授、森由利亞教授、程樂松教授、周治教授、廣瀨直紀博士、陸晶晶博士、賴思妤小姐、劉青小姐、盛聰先生、郭寧萱小姐、徐浩先生、石涵冰先生等師友的幫助，初稿承蒙黎師志添、呂妙芬教授、尹翠琪教授、黎子鵬教授惠賜修改意見，論文審查期間復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¹³¹ 佛教元素與扶乩活動的結合同樣值得關注，只是本文所探討的文本較少涉及佛教元素，因此有待日後進一步深究。

附表：已知各版本文帝類全書的基本資訊¹³²

類別	序號	出版時間	刊刻地	正題名	卷數	主要責任者	已知藏館
32 卷本	1	乾隆八年 至十年	黔南 (貴州)	文帝全書	32 卷	劉樵編	北京大學
	2	乾隆 十一年	古州 (貴州)	文帝全書	32 卷	劉樵編 劉占爵敘揆 俞文耀訂梓	或已佚失
	3	乾隆 五十九年	未知	文帝全書	32 卷 附羣真 著述	劉樵編 蔣源嶽等重刊	上海圖書館
	4	光緒二年	常州 (江蘇)	文帝全書	32 卷 附羣真 著述	劉樵編 吳惠重刊 陸初望重刊	華東師範大學 復旦大學 北京大學 天津圖書館 巴伐利亞國立圖 書館 普林斯頓大學
50 卷本	5	乾隆 四十年	杭州 (浙江)	文帝全書	50 卷 附錄 1 卷	劉樵編 關槐增訂	北京大學 名古屋大學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靜嘉堂文庫 一橋大學 早稻田大學 哈佛大學
	6	道光 二十五年	湄洲 (廣東)	文帝全書	50 卷 附錄 1 卷	劉樵編 關槐增訂 蔡傑重刊	大英圖書館
38 卷本	7	道光 二十七年	楚鄂 (兩湖)	文帝全書增纂	38 卷 附羣真 著述	劉樵編 楚鄂同人增訂	湖南省圖書館
	8	同治八年	楚鄂 (兩湖)	文帝全書	38 卷 附羣真 著述	劉樵編 楚鄂同人增訂 聚鶴樓重刊	中國國家圖書館

¹³² 除表中所列諸版本外，筆者也發現有個別殘本，其特徵似道光以後的版本，分別為山陰陳懋藝重刊本、石楊李本傳重校本、四香草堂重刊本。三者與附表中諸版本的排版皆有所不同，介於殘損嚴重，且未見明顯文本出入，因此暫不做深入探討。

清代六種文帝類全書的出版史研究

類別	序號	出版時間	刊刻地	正題名	卷數	主要責任者	已知藏館
文昌聖典	9	道光二年	平月 (貴州)	文昌聖典	36 卷	金本存編 王帽重刊	南京圖書館
文昌帝君全書	10	道光八年	(四川)	文昌帝君全書	28 卷	劉樵編 甘雨施增纂	中國國家圖書館 四川大學
	11	道光三十年	(四川)	文昌帝君全書	28 卷	劉樵編 甘雨施增纂	北京大學
	12	光緒九年	北京	文昌帝君全書	28 卷	劉樵編 甘雨施增纂 鄭子元增纂	北京大學
節錄本	13	乾隆三十三年	未知	文帝書鈔	14 卷	朱珪編	或已佚失
	14	乾隆五十七年	未知	文帝書鈔	14 卷	朱珪編 李永恆重刊	或已佚失
	15	乾隆六十年	未知	文帝書鈔	14 卷	朱珪編 高凌雲翻刻	筆者私藏
	16	嘉慶十五年	粵東 (廣東)	帝君書鈔	不分卷	朱珪編 郭青重刊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17	道光二十九年	崞邑 (山西)	文帝書鈔	14 卷	朱珪編 重刊者不明	網路拍賣紀錄
	18	咸豐十年	(山西)	文帝書鈔	14 卷	朱珪編 重刊者不明	網路拍賣紀錄
	19	同治十二年	天津	文帝書鈔	14 卷	朱珪編 葛慶同重刊	東京都立圖書館
	20	光緒八年	北京	文帝書鈔	14 卷	朱珪編	早稻田大學
	21	嘉慶年間	杭州 (浙江)	文帝全書	不分卷	劉樵編 沈恒選	東京都立圖書館

附圖

公元紀年

年號

乾隆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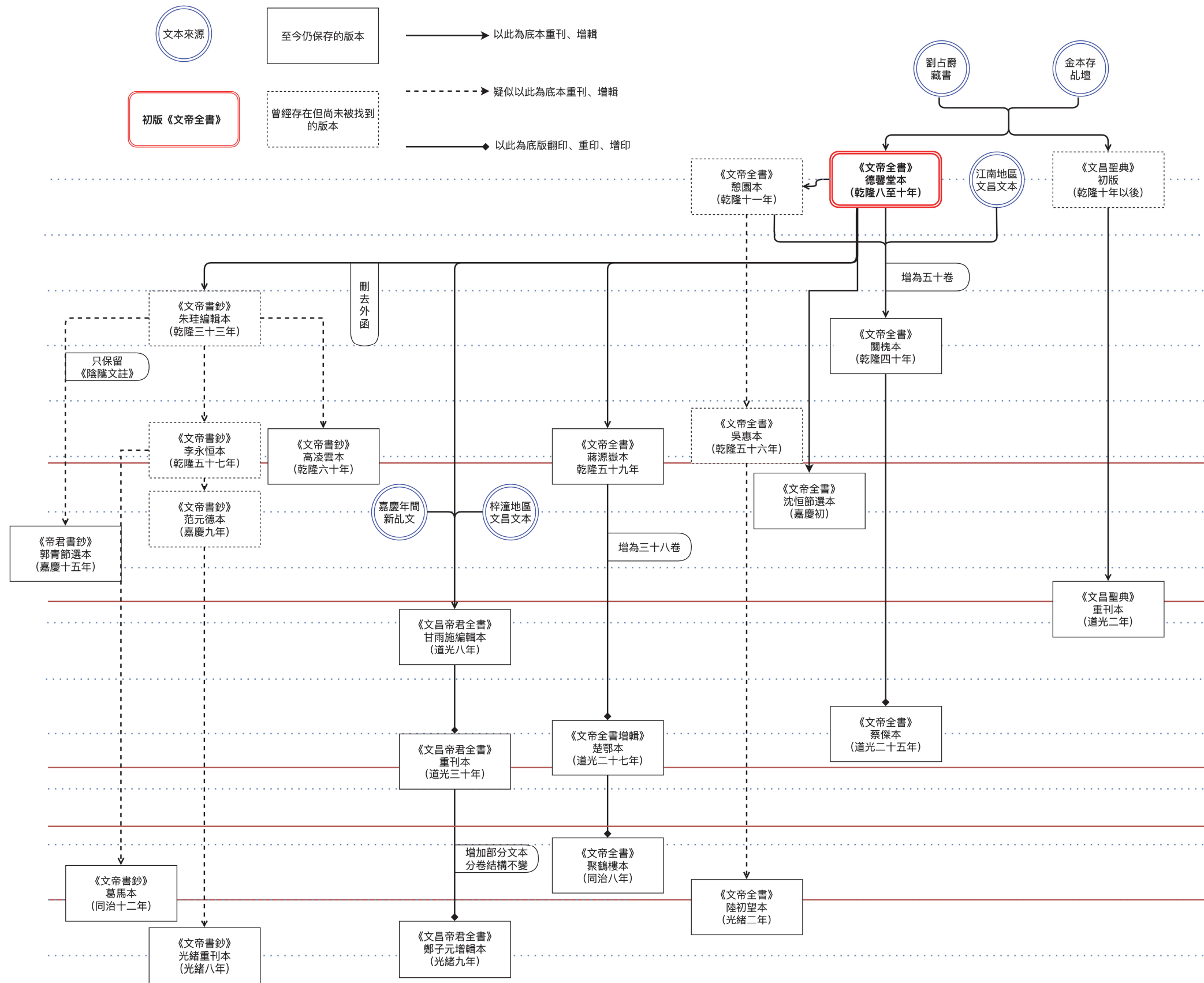
嘉慶元年

道光元年

咸豐元年

同治元年

光緒元年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佚名，《梓潼帝君救劫寶章》，收入明・胡文煥編，《格致叢書》，明萬曆年間刻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清・甘雨施編，《文昌帝君全書》，清道光八年刊本，成都：四川大學圖書館藏。
- 清・甘雨施編，鄭子元增輯，《文昌帝君全書》，清光緒九年刊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清・朱珪編，高凌雲重刊，《文帝書鈔》，清乾隆六十年刊本，筆者私藏。
- 清・朱珪編，葛慶同、馬錫奎重刊，《文帝書鈔》，清同治十二年刊本，東京：東京都立圖書館藏。
- 清・李涵虛輯，《呂祖全書》，空青洞天藏版，收入《道藏精華》第9集，臺北：自由出版社，1967。
- 清・金本存編，王帽重刊，《文昌聖典》，清道光二年重刊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
- 清・崑岡等總裁，《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清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
- 清・郭青編，《帝君書鈔》，清嘉慶十五年刊本，倫敦：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藏。
- 清・湯萬煌註，《文昌孝經》，清乾隆三年刻本，京都：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 清・黃啟曙編，《關帝全書》，清咸豐八年刊本，收入《關帝文獻彙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第6冊。
- 清・趙爾巽等編，《清史稿》，民國十七年清史館本。
- 清・劉樵彙集，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收入《中華續道藏・初輯》，臺北：新文豐，1999，第20冊。
- 清・劉樵彙編，羅圓吉續編，《呂祖全書》，清光緒五年刊本，收入《中華續道藏・初輯》第19冊。
- 清・劉樵編，《文帝全書》，清乾隆八年至十年刊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清・劉樵編，《文帝全書》，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清・劉樵編，《呂祖全書》，清乾隆十一年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清・劉樵編，《呂祖全書》，疑似清乾隆刊本，收入《藏外道書》，成都：巴蜀書社，1992-1994，第7冊。
- 清・劉樵編，沈恒選，《文帝全書》，疑似清嘉慶年間刊本，東京：東京都立圖書館藏。

胡劫辰

清·劉樵編，邵志琳增訂，《呂祖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清·劉樵編，陸初望重刊，《文帝全書》，清光緒二年重刊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清·劉樵編，楚鄂同人增訂，《文帝全書增纂》，清道光二十七年刊本，長沙：湖南省圖書館藏。

清·劉樵編，楚鄂同人增訂，聚鶴樓弟子重刊，《文帝全書》，清同治八年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劉樵編，關槐增訂，《文帝全書》，清乾隆四十年刊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清·劉樵編，關槐增訂，蔡傑重刊，《文帝全書》，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倫敦：大英圖書館藏。

清·劉鑑編，《桂香鏡》，清道光十七年刻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孚佑帝君釐定，在壇諸子校字，《呂祖彙集》，清咸豐間刊本，收入《中華續道藏·初輯》第19冊。

Rev. Lyon, D. N. "Life and Writings of God of Literature (文帝全書)."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20.9 (1889): 411-420.

Rev. Lyon, D. N. "Life and Writings of God of Literature (文帝全書)."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20.10 (1889): 439-449.

二·近人論著

丁培仁

2004 〈明道藏有關文昌梓潼帝君文獻考述〉，《宗教學研究》2004.3：41-52。

王見川、皮慶生

2010 《中國近世民間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興平

2004 〈劉安勝與文昌經〉，王興平等編，《中華文昌文化——國際文昌學術研究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頁315-324。

井上進

2013 〈出版文化與學術〉，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頁475-495。

尹志華

2012 〈《呂祖全書》的編纂與增輯〉，《宗教學研究》2012.1：16-21。

李家駿

- 2012 〈《呂祖全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論文。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 2002 〈《道藏》中的民間信仰〉，氏著，《中國文化基因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胡劼辰

- 2016 〈《文昌帝君陰騭文》起源新研：以《為善陰騭》、《勸行陰騭文》以及《梓潼帝君救劫寶章》為中心〉，李世偉主編，《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十一）》，新北：博揚文化，頁 133-169。
- 2019 〈明清關帝文獻初探：清代前中期關帝類合集的文獻史研究〉，《道教學刊》3：92-115。

洪淑苓

- 2007 〈文人視野下的關公信仰：以清代張鎮《關帝志》為例〉，《漢學研究集刊》5：139-166。

高梧

- 2008 《文昌信仰習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張澤洪

- 2004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文昌帝君〉，王興平等，《中華文昌文化》，頁 116-121。

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

- 2010 〈「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宗教學研究》2010.3：17-27。

森由利亞

- 2001 〈《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東方宗教》98：33-52。

游子安

- 1999 《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黎志添

- 2013 〈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2：183-230。
- 2015 〈《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6：101-149。

胡勅辰

- 2016 〈識見、修煉與降乩：從南宋到清中葉呂洞賓顯化度人的事蹟分析呂祖信仰的變化〉，《清華學報》46：41-76。
- 2017 〈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及相關文人乩壇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5：139-179。

戴均良等主編

- 2005 《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謝政修

- 2015 〈《文昌化書》研究：以七十四至九十七化為主〉，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聰輝

- 2013 《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大木康

- 2004 《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

石井昌子

- 1985 〈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と上清大洞真經との關係〉，《創大アジア研究》6：73-101。

伊藤晋太郎

- 2007 〈関羽文献の本伝について〉，《慶應義塾大学藝文学会》93：29-47。
- 2018 《「関帝文献」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酒井忠夫

- 1957 〈陰騭文の成立について〉，《東方宗教》1957.7：1-13。
- 1999-2000 《増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

森田憲司

- 1984 〈文昌帝君の成立——地方神から科学の神へ〉，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 389-418。

Burton-Rose, Daniel (羅丹寧)

- 2015 “A Prolific Spirit: Peng Dingqiu’s Posthumous Career on the Spirit Altar, 1720-1906.”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7: 7-62.
- 2016 “Terrestrial Reward as Divine Recompense: The Self-fashioned Piety of the Peng Lineage of Suzhou, 1650-187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Goossaert, Vincent (高萬桑)

- 2014 “Modern Daoist Eschatology: Spirit-Writing and Elite Soteri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6: 219-246.
- 2015 “Spirit Writing, Cano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Divine Saviors: Wenchang, Lüzu, and Guandi, 1700-1858.” *Late Imperial China* 36.2: 82-125.
- 2017 “The Textual Canonization of Guandi.” In *Rooted in Hope: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Roman Malek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edited by Barbara Hoster, Dirk Kuhlmann, and Zbigniew Wesolowski.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pp. 509-526.

Kim, Jihyun

- 2015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s: With a Focus on Innovations in the *Scripture of the Great Cavern* in Ming-Qing Daoism.”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7: 63-115.

Kleeman, Terry L. (祁泰履)

- 1993 “The Expansion of the Wench’ang Cult.” I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edited by Patricia B.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45-73.
- 1994 *A God’s Own Tale: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of Wenchang, the Divine Lord of Zito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ipper, Kristof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 2004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胡劭辰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ubli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of the Wenchang Canons in Six Varieties

Jiechen Hu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rough the lens of publishing history existent editions of the *Wendi quanshu*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Divine Lord of Wenchang) housed in public librari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To some extent, my objective is to fill the gap in the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the Wenchang cul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Wendi quanshu* is a compilation concerning the Wenchang cult that held sway in the Qing dynasty. First composed in the early Qianlong reign, the compilation was subsequently recompiled and republished more than ten times in many provinces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Examples of anthologies or compilations of Wenchang text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include the *Wendi shuchao* (Anthology of Divine Lord of Wenchang), the *Wenchang shengdian* (Sacred Scripture of Wenchang), and the *Wenchang dijun quanshu*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Divine Lord of Wenchang).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to a unique historical phenomenon, i.e. an attempt at establishing “Orthodox Confucianism”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Wendi-related compilations. The objective is twofold. Namely,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worshipping Wenchang substantiated the Wenchang cult incorporating it into Confucius teachings. In the same spirit, they revamped Confucius teachings by adopting Wenchang spirit-writing practices. Their effort resulted in practic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mainstream Confucianism, and such practices constituted an integral part to the religious spectrums in the final phase of China’s imperial regime.

Keywords: the *Wendi quanshu*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Divine Lord of Wenchang), Wenchang cult, spirit-writing, Confucian scholars in Qing, morality books